

In the next issue:

Guest Editor: Chang Nam Fung

張南峰

Articles

Special Issue on Translation and Ideology

翻譯理論對譯者有用嗎？

羅倫斯·文努提

用多元系統理論研究翻譯的意識形態的局限

莊柔玉

西方傳教士與中國近代之外國文學翻譯

劉樹森

文學翻譯中的刪改

王曉元

Ideological Manipulation of Translated Texts

Nitsa Ben-Ari

Subversion, Sex and the State:

The Censorship of Translations in Modern Japan

Judy Wakabayashi

A Cry for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Maori-English Cultural Translation

Akiko Uchiyama

Cultures Translated and Appropriated:

Rethinking Ethnicity, Nationscape and

Cultural Identity

Mao Sihui

Book Review

宗教、政治、意識形態與翻譯

張萍、柯平

ISSN 10278559



9 771027 855003

Translation Quarterly

No.15 March 2000

Special Issue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Past and Future

香港翻譯學會出版

翻譯季刊

二〇〇〇年
第十五期
中國翻譯研究的
回顧與展望專號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Translation Quarterly

No.15 March 2000

Special Issue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Past and Future

香港翻譯學會出版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翻譯季刊

二〇〇〇年
第十五期
中國翻譯研究的
回顧與展望專號

翻譯季刊

Translation Quarterly

香港翻譯學會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翻譯季刊》

Translation Quarterly

二〇〇〇年 第十五期

No. 15, 2000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00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ISSN 1027-8559

Printed by WORLD FAIR DESIGN LTD. 緯輝設計有限公司承印

編輯委員會 **Editorial Board**

劉靖之 (主席) Liu Ching-chih (Chairman)

黎翠珍 Jane Lai 吳兆朋 E. S-P. Almberg

陳德鴻 Leo Tak-hung Chan 羅志雄 Lo Chi-hong

金聖華 Serena Jin 孫藝風 Sun Yifeng

黃國彬 Laurence Wong

主編 **Chief Editor**

劉靖之 Liu Ching-chih

執行編輯 **Editors-in-Charge**

陳德鴻 Leo Tak-hung Chan

孫藝風 Sun Yifeng

本期特約編輯 **Guest Editor of This Issue**

張南峰 Chang Nam-fung

顧問委員會 **Advisory Board** (按音序 in alphabetical order)

鄭仰平 Cheng Yang-ping 羅新璋 Lo Xinzhang

高克毅 George Kao 馬悅然 Göran Malmqvist

何丙郁 Ho Ping-yuk 紐馬克 Peter Newmark

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奈達 Eugene Nida

賴恬昌 Lai Tim-cheong 王健 Jan W. Walls

劉紹銘 Joseph S. M. Lau 楊憲益 Yang Xianyi

林太乙 Lin Tai-yi 余國藩 Anthony Yu

林文月 Lin Wen-yueh 余光中 Yu Kwang-chung

目錄 CONTENTS

vi	從多元系統理論的角度看中國的 翻譯研究——代序	張南峰
	論文 Articles	
1	論“信達雅”說在中國傳統翻譯 理論中的位置	朱志瑜
19	舊題新解： 從國際互動看中國翻譯	朱純深
37	Globalization, Cultural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WANG Ning
51	繼往開來 融通中西 ——二十一世紀中國翻譯研究展望	陳潔瑩
	書評 Book Review	
75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r Translation Studies?	Leo Tak-hung CHAN
82	論文摘要 Abstracts	
86	作者簡介 Notes on Contributors	
88	稿約凡例 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93	訂閱表格 Subscription Order Form	

從多元系統理論的角度看中國的翻譯研究 ——代序

張南峰

伊塔馬·埃文—佐哈爾 (Itamar Even-Zohar) 的多元系統論 (polysystem theory)，雖常用於文學和翻譯研究，但它其實是一種文化理論，可用來指導任何一種文化現象的研究。我想借編輯本專號的機會，嘗試借用多元系統論為框架，並參考本期四位作者的研究所得，描述和解釋中國的翻譯研究這種文化現象，並對其未來發展作一些粗略的預測。

一、位處邊緣，自給自足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大部分時間在區內處於強勢地位。中國文化這個多元系統，¹是一個古老的、早已確立的系統，一向自給自足、不假外求；與別的文化系統發生關係時，則處於中心位置，影響別人多於受別人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翻譯活動只是偶爾參與塑造文化系統的中心（佛經翻譯可說是唯一的例外）；也就是說，翻譯系統多數時候處於中國文化系統的邊緣位置（參 Even-Zohar, 1990b: 46），而且並不活躍。因此，翻譯研究自然也是一個不活躍的邊緣系統。

近二三百年來，中國的科技和生產力逐漸落後於西方；同時，中國文化被迫與西方文化接觸。於是，中國文化多元系統在新發現

的世界大多元系統 (macro-polysystem) 中處於邊緣位置，從文化輸出國變成了文化輸入國，翻譯活動從此日益頻繁，在五四前後到達最高潮，並積極參與文化多元系統的中心的塑造，成為推動中國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生產方式、文學藝術、語言文字等各個方面的變革的一股原動力。也就是說，作為中國文化多元系統從地區大系統的中心走到世界大系統的邊緣的必然結果，翻譯系統從中國文化多元系統的邊緣走到了中心。²

與此同時，翻譯研究系統也從嚴復開始活躍起來。但是，它並未跟隨翻譯系統走進文化多元系統或其中的學術多元系統的中心。究其原因，起碼有三：

第一，從實踐到應用研究再到學術研究，必須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嚴格的來說，中國的翻譯理論始自嚴復《天演論·譯例言》。」（劉靖之，1981: 1）朱志瑜評論說，嚴復「信達雅」說的提出，「是翻譯史上的一次革命」；不過，其後一百年來，中國翻譯界花了許多精力將嚴復的「三字經」改頭換面，或重加界定，但這些「新三字經」「實際仍在原地踏步，沒有實質的發展」。王寧更認為，中國其實沒有真正的翻譯研究，只有翻譯批評，「基本上局限於對翻譯實踐的沒完沒了的技術分析和膚淺的價值判斷」。陳潔瑩也批評說：「以往翻譯理論只重實踐應用，流於技術水平」。用多元系統理論的術語來說，則是中國的翻譯研究系統——或者，更確切地說——翻譯學術研究系統，依然幼嫩，尚待發展、確立。

第二，翻譯研究仍未起步時，文學和語言學研究早已展開，被奉為學術研究的正統，翻譯研究則受到輕視（另見下文討論）。換句話說，文學和語言學在人文學科的學術研究系統中站到了中心的位置，並且為了維持甚至獨佔這個位置而有意或無意地排斥新興的

翻譯學；其方法有二：一是不承認翻譯研究是學術；³二是把自己的研究模式套用在翻譯研究上，並且排斥新的研究模式，從而把翻譯學納入自己的範疇，即文學之下的比較文學的分支，或者語言學之下的應用語言學或對比語言學的分支。這兩種方法，都能夠令翻譯學得不到正式的學科地位。⁴因此，建立翻譯學的口號雖已喊了許多年，但至今仍未成事，起碼未能在中國的社會科學院裡設置自己的研究所。

第三，中國現代的許多學術科目，都引進西方的思想和研究模式，但翻譯研究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大致上在走自己的路，只在五十年代曾略受蘇聯影響，因此其學術發展速度落後於許多學科。

埃文-佐哈爾認為，多元系統裡的不同系統，是在永無休止地互相爭奪中心地位的 (1990a: 14)。但是，直到十多年前，在中國我們只看見人文學術研究多元系統中的中心系統在排斥翻譯學，卻看不見翻譯學向中心系統提出有力的挑戰。首要原因是在八十年代以前，翻譯研究大體上是翻譯家、文學家和語言學家的副業，很少人專職從事翻譯研究；因此，翻譯學被排斥，只有得益者而沒有受害者。其次，翻譯學處於邊緣位置，在七十年代仍是全世界的普遍現象，所以大家也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其三，雖然西方的翻譯研究從六七十年代開始，學術性和規模都在迅速發展，到八十年代逐步走向或融入中心，但在中國還沒有多少人注意到這個趨勢，所以翻譯研究系統依然滿足於現狀。

總括而言，中國的廣義的翻譯研究雖然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但作為一個學術研究系統，依然幼嫩。儘管如此，它維持自給自足、不假外求的狀況，⁵卻比中國文化多元系統更加長久。直到八九十年代，這個系統的主流或中心部分依然有良好的自我感覺，自

認為有豐富傳統，「獨具特色」、「自成體系」，覺得沒有必要與其他文化的翻譯研究系統交流，更沒有必要借鑑別人的理論和模式（羅新璋，1984；另參張南峰，1998b）。

二、向世界的邊緣躍進

但是，七十年代末期，「文革」結束，中國人普遍對現狀感到不滿，中國文化出現了轉捩點或者危機，同時重新接觸西方文化，於是開始五四之後的另一次西方文化的大規模引進，翻譯研究也不例外。幾位在當時地位還不很高的年輕學者，由於對中國翻譯研究的現狀感到不滿，八十年代開始譯介了一些西方翻譯理論，其中大多是語言學派的翻譯理論，例如奈達 (Eugene A. Nida)、紐馬克 (Peter Newmark)、卡特福德 (J. C. Catford) 等等，給中國的譯論界帶來了一定的衝擊；奈達的等效理論更一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大有壓倒嚴復「信達雅」說之勢。換言之，翻譯研究多元系統中的邊緣系統（即西學派），借助外國理論，向中心系統（即傳統學派）挑戰，最後形成了兩個近乎平起平坐的，既互相競爭又互相依存的中心系統。

西方譯論的引進，雖然帶來了衝擊，但并未掀起革命。這些譯論，對中國的翻譯研究而言是新鮮事物，但在其發源系統裡面，用多元系統論的術語來說（參 Even-Zohar, 1990a: 21），大體上不是「一級」(primary) 即革新的，而是「二級」(secondary) 即保守的產品。⁶以奈達的等效論為例，⁷其目標是制訂以「忠實」為本的翻譯標準，與中國的傳統譯論同屬規範性的應用理論，而且與「信達雅」基本相容，與中國的傳統譯論形成了一種「共謀」(complicity)

的關係，一起強化了中國的翻譯研究的實用主義路向和傳統的道德觀念。⁸正因如此，奈達的理論才能輕易進入中國翻譯理論多元系統的中心。（參張南峰，1998a: 31）

陳潔瑩認為，「中國傳統不重視純知識活動，學優而仕原以代耕，所在乎者為濟世利民，政治教化」，因此，非以實踐應用為本的理論就得不到發展。但是，「任何學術發展至最高峰，哲學的探索必不可少」。反過來說，純粹着眼於應用的研究，不可能把一門學術科目推上高峰。八十年代外國應用譯論的引進，提高了中國翻譯研究的學術性，雖可說是繼趙元任的文章〈論翻譯中信、達、雅的信的幅度〉之後，標誌着中國翻譯理論從傳統走向現代（參朱志瑜）的第二個里程碑，但在語言學等其他一些人文學科已開展純學術研究的情況下，外國應用譯論只能帶領翻譯研究系統從人文學科學術研究多元系統的邊緣朝着中心邁出一步，而不可能帶領它走到中心。

引進西方譯論的更大意義，也許在於把本來相對獨立的中國翻譯研究系統，帶進了世界翻譯研究多元系統。由於中國文化處於世界文化大多元系統的邊緣，而且中國的翻譯學術研究確實起步較晚，所以中國翻譯研究系統只能在世界翻譯研究多元系統中佔據邊緣位置。

三、脫離邊緣的策略

中國翻譯研究的主流，以外國理論不適合指導中國的翻譯實踐為理由，反對與外國的翻譯研究界交流（參張南峰，1998b），這其實是下意識地看到自己在中國翻譯研究系統的中心地位受到威脅

而中國翻譯研究又從自給自足、相對獨立的系統變成世界翻譯研究多元系統中的邊緣系統而產生的非學術性的反應（參下面朗貝爾的引文），也就是朱純深所說的那種隱隱約約地透出來的「自我孤立導致的憂患心態」。王寧指出，當今的世界潮流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而中國是勉強地選擇了順應這股潮流的。在這種情況下，正如朱純深所說，「中國翻譯在世界譯學大系中是不可能自成一體的，更是無法自外於其他譯論體系的」。

那麼，面對着中國翻譯研究系統邊緣化的形勢，我們如何自處呢？首先必須強調，從事學術研究，不能被民族自豪感、自卑感之類的情緒所干擾，有時甚至應該拋開自己的民族身分，才能高瞻遠矚，客觀理性（參朱純深）。但是，身為中國翻譯研究系統中的一分子，我們自然不甘心這個系統永遠處於邊緣。本期的四篇文章，為我們提供了一些脫離邊緣的策略。

朱志瑜從翻譯理論的角度深入地探討了「信達雅」的意義并且回顧了一百年來圍繞「信達雅」的討論，在肯定嚴復對翻譯理論的貢獻之餘指出：「今天，它只有歷史價值，在學術上，『信達雅』只應屬於翻譯理論史研究的課題。」也就是說，翻譯理論研究不應再停留在這個層次上，不應再原地踏步了。朱志瑜又認為，重描述不重規範，才能令翻譯理論從傳統走向現代。

朱純深和陳潔瑩都對「中國翻譯學」的提法提出了質疑。他們和王寧都主張，中國的翻譯研究應積極面對全球化的潮流，參與國際交流。朱純深指出，科學研究是無國界的；而且，國際翻譯理論體系間的互動，對每個個別的體系都大有好處，原因在於：「換一個觀察角度，便可能帶來新發現新見解；而新的觀察角度、新的研究視點，往往產生於同其他理論體系的互動中。」

朱純深說的理論體系之間的互動，不單是不同文化中的翻譯研究系統之間的互動，而且包括不同學派（例如語言學派和文藝學派）所形成的系統之間的（良性）互動。陳潔瑩也同意，「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派別按不同的現實情況及需要採取不同的方法進行不同的研究，都是對整個學科有貢獻的，不應拘泥於門戶之見、新舊之爭」。

陳潔瑩詳盡地探討了翻譯學的構架和術語的問題。她認為，建立構架，澄清概念，有助拓寬視野，發展知性理論，提高研究水平，便於不同文化和不同學科之間開展對話，達致翻譯研究的國際化和中西文化的融通。

王寧則強調，中國學術界須與西方學術界就翻譯研究的問題展開平等對話，而最適合的話題是大家都感興趣的文化研究。他認為，從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譯，好處甚多，不單可以消除語言學和文學的分野，拓寬翻譯學的研究範圍，提升其學術層次；而且，由於文化研究關心的是當代的非精英文化，所以它還有助於解構單一中心的神話以及中心與邊緣之間的人為鴻溝，讓東方文化從世界的邊緣走到中心。

四、困難所在

不過，必須看到，中國翻譯研究系統從邊緣走向中心的道路，將是崎嶇的。比利時學者荷西·朗貝爾(José Lambert)用多元系統論解釋西方的翻譯研究系統在發展的過程中曾經遇到甚至仍在面對的一些障礙，值得我們參考。

首先，新的模式、理論出現時，必然會受到排斥：

學者們看見他們的研究範圍出現新模式時，為何會產生情緒化而非學術性的反應呢？多元系統理論的答案會是：新模式必然與舊模式進行競爭，威脅已建立的（權力）地位。[……] 學者和學術并非天真無邪的，他們要追求名望和卓越，[……] 以爭取影響力和權力。（Lambert, 1995: 112）

其次，從文化學的角度對翻譯現象進行歷史—描述性研究，涉及多個學科的範疇，需要大量的人力、資金以及機構的支持。但是，「在我們這個頗為封建的學術界，學科的劃分是靠政治遊說而非學術論說來決定的，所以做跨學科的研究十分艱難」（同上：134）。

第三，翻譯的文化研究必然牽涉對權力、政治、規範、意識形態等方面的描述性研究。但是，多元系統論本身就可以解釋，「聚焦於規範和權力而又不支持它們的研究為何總會被視為威脅」。「利用學術研究來歌頌英雄、巨星和道德，畢竟容易得多了。」（同上：135）

儘管如此，朗貝爾所在的洛文天主教大學（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文學翻譯研究已經做了三十年了。（參 Lambert, 1988）

在中國開展對翻譯的文化研究，在這三方面遇到的阻力必然更大。翻譯的描述性文化研究，不但需要全新的理論和模式，而且需要與中國的實用主義傳統價值觀完全相悖的理論和模式，所以會同時受到權力系統和意識形態系統的排拒。

在中國，翻譯學還算不上一門學科，跨學科就更不用說了。按國家技術監督局的分類，它只是應用語言學之下的一門三級學科，因此在申請研究撥款、開設研究生課程等方面都要吃虧。（參尚

岩，1999）況且，它既是應用語言學的分支，要在它的名義之下開展跨學科的對翻譯現象的文化研究，自然難以得到建制的支持。中國的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的經費本來不多，願意分給三級學科的就更少。如此缺乏經費，又如何拿出研究成果去與西方交流呢？憑什麼走進世界翻譯研究多元系統的中心呢？

正如王寧所說，在全球化的潮流影響下，中國的學術研究已較少受到政府的政治干預。但是，比起西方國家來說，中國的權力系統和意識形態系統，在整個文化大系統中，依然是壓倒一切的，寬容度較小的。在比利時對權力和規範進行客觀中立的描述性研究尚且感受到壓力，何況在中國呢！不錯，文化研究是東西方學術界都感興趣的話題，但西方的文化研究，目前最感興趣的是權力、意識形態與其他文化產物的關係，如文學研究、翻譯研究、女性研究都是如此；研究者對於其研究範圍內的多元系統中各個競爭系統所持的立場，要麼中立，要麼同情弱小的邊緣系統；而當代中國社會的這類關係，仍然是學術研究的敏感區甚至禁區，如要研究，（在正式場合）也難以不採取支持中心系統的立場。因此，不少學者要麼迴避權力和意識形態問題，要麼只談歷史。這也大大增加了學術研究以及交流對話的難度。

況且，中國的翻譯研究學者還要面對一個在西方已成過去的困難，就是翻譯研究在學術界受到的輕視。⁹在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的西方，翻譯研究仍是處於學術研究的邊緣的（Even-Zohar, 1990b: 46; Lefevere and Bassnett, 1990: 12），原因是人文學科以文化地位而不是內在趣味作為選擇研究對象的準則，而翻譯的文化地位一向較低（Delabastita, 1990: 97），儘管它有時會起很大的社會作用。但是，八九十年代流行的文化研究，卻把注意力轉移到邊緣系

統，或起碼與中心系統一視同仁。¹⁰可以說，在目前的西方，對各種邊緣系統的研究，正在走向學術研究多元系統的中心；而在中國，翻譯研究目前的地位與七八十年代的西方相似。

總之，與西方比較，在中國開展翻譯研究，尤其是對翻譯的文化研究，困難大得多。我們如要讓中國的翻譯研究走向世界的中心，就必須付出比西方學者更大的努力。

註釋

- ¹ 本文所說的文化多元系統，是一個上位概念，指的是一個社群的「整體文化」，由諸如語言、文學、經濟、科技、政治、意識形態等等較小的多元系統組成（參 Even-Zohar, 1990a: 23）。
- ² 翻譯文學佔據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的標誌之一，是著名作家往往身兼翻譯家（參 Even-Zohar, 1990b: 46-47）；五四時期的情況正是如此。
- ³ 不承認翻譯研究是學術的具體表現之一是，「人人都是專家，卻從沒懷疑過，其實裡頭有東西要學」（Even-Zohar, 1981: 1）。例如，一些在文學理論方面居於領先地位的學者，卻常常「用過時的語言來談論翻譯」（Bassnett, 1998: 108）。
- ⁴ 筆者并非要提倡陰謀論。這種系統之間的排斥，可說是一種「自然現象」，無論參與者是有心還是無意（也許多數是無意的）。從多元系統理論的觀點看來，文化系統中的成員（例如翻譯系統中的作品、學術系統中的學者）的行為，是由其系統地位決定，或起碼是受其影響的；換言之，這些行為，均有其「系統性」。這個概念，可與馬列主義理論中的「階級性」相類比。
- ⁵ 這是相對於其他文化的翻譯研究系統而言的。它當然「有求」於中國文化中的其他系統（例如意識形態等等）了。
- ⁶ 埃文－佐哈爾認為，任何文化產物都有一個控制其製造和使用的「形式庫」（repertoire），由規則和材料兩部分組成；例如，語言的形式庫就是語法加詞彙（Even-Zohar, 1990c: 39）。產品如嚴格按照形式庫定下的模式製造，因而可預測性很高，就稱為二級產品；如注入一些新元素，從

而擴大和改造形式庫，使產品的可預測性一個比一個低，結果就是一級的產品和革新的系統。（Even-Zohar, 1990a: 21）他所說的一級二級、革新保守，並無褒貶之意。

- ⁷ 奈達的理論在六十年代提出來時，曾推動了西方翻譯研究的發展，但到八十年代引入中國時，它在西方的一級地位已給其他理論取代了，其中包括在它影響之下發展出來的目的論（參 Bassnett, 1998: 108-109）。
- ⁸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譚載喜（1999: 28）在把中國的傳統理論與西方的一些二級理論比較之後總結說，忠實之類的原則，「是中西方，乃至所有人類翻譯傳統所熟悉的共同準則」，卻避而不談西方一些反對以忠實為（唯一）準則的一級理論，如翻譯研究學派、解構主義、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的翻譯理論，以及目的論。
- ⁹ 這個問題與上文談到的學科地位有關，但其影響比較深層。
- ¹⁰ 拿多元系統論來說，它并不以價值判斷作為選擇研究對象的準則；例如，對文學多元系統的歷史研究不能局限於所謂「傑作」，就如普通歷史不能局限於帝王將相的傳記一樣。精英主義與多元系統論是不相容的；因為，忽視邊緣系統的存在，就不能全面研究中心系統。（Even-Zohar, 1990a: 13）

參考書目

- Bassnett, Susan. 1998. "Research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ase for Doctoral Research". Peter Bush and Kirsten Malmkjar (eds). *Rimbaud's Rainbow: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05-118.
- Delabastita, Dirk. 1990. "Translation and the Mass Media". Su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evere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reprinted London and New York: Cassell 1995). 97-109.
- Even-Zohar, Itamar. 1981. "Translation Theory Today: A Call for Transfer Theory". *Translation Theory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Poetics Today*, 2: 4.1-7.
- Even-Zohar, Itamar. 1990a. "Polysystem Theory".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 Today* 11: 1. 9-26.

- Even-Zohar, Itamar. 1990b.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 Today* 11: 1. 45-51.
- Even-Zohar, Itamar. 1990c. "The 'Literary System'".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 Today* 11:1. 27-44.
- Lambert, José. 1988. "Twenty Years of Research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t the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Harald Kittel (ed.). *Die literarische Übersetzung: Stand und Perspektiven ihrer Erforschung*. Berlin: Erich Schmidt. 122-138.
- Lambert, José. 1995. "Translation, Systems and Research: The Contribution of Polysystem Stud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TTR* 8:1, 105-152.
- Lefevere, André and Susan Bassnett. 1990. "Introduction: Proust's Grandmother and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Su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evere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1-13.
- 劉靖之。1981。〈重神似不重形似——嚴復以來的翻譯理論（代序）〉。劉靖之編，《翻譯論集》。香港：三聯書店，頁1-15。
- 羅新璋。1984。〈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翻譯通訊》編輯部編，《翻譯研究論文集（1949-1983）》。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頁588-604。
- 尚岩。1999。〈加強翻譯學科的建設——許鈞教授訪談錄〉。《中國翻譯》6，34-37。
- 譚載喜。1999。〈中西譯論的相似性〉。《中國翻譯》6，25-28。
- 張南峰。1998a。〈以『忠實』為目標的應用翻譯學——中國譯論傳統初探〉。《翻譯學報》2，29-41。
- 張南峰。1998b。〈特性與共性——論中國翻譯學與翻譯學的關係〉。'98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翻譯研討會暨國際口筆譯教學第四屆年會論文，將刊於《中國翻譯》2000: 2。

論“信達雅”說在中國傳統翻譯理論中的位置

朱志瑜

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裡提出的“信達雅”原則，到今天整整一個世紀了。最初這個原則得到翻譯界一致的推崇。白話文運動興起以後，“雅”字首先受到衝擊；“譯須信達雅”變成了對嚴復的諷刺，說他“一個雅字打消了信和達”（瞿秋白，1984a：266-267）。後來的學者針對“雅”字，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正方案，但最廣為人知的還是“信達雅”。到了九十年代，從翻譯教材到翻譯課教學，“信達雅”仍然佔有相當大的比例。一百年來中國翻譯界出現的幾場大的爭論，都和“信達雅”的原則有關。可以說，嚴復的這三個字左右了中國現代翻譯理論的發展，是中國現代影響最大，引起爭論最多的理論體系。嚴復的理論是在總結了古代佛經翻譯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要辨析它的涵義，判斷它的價值，就必須將它置於中國傳統翻譯理論的框架中來討論。本文擬從翻譯理論的角度（即不考慮政治、社會、歷史等因素）探討“信達雅”說的實在價值和它在中國傳統翻譯理論中的位置。

先看看“信、達、雅”的來源。錢鍾書指出，此三字皆見於三國時期支謙的“法句經序”（1984：23）；徐永煥認為嚴復是受了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的影響（1984：682）。¹〈法句經序〉是這樣寫的：

始者維祇難出自天竺，以黃武三年來適武昌。僕從受此五百偈本，

請其同道竺將炎為譯。僕初嫌其辭不雅。維祇難曰：“佛言依其言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者，當令易曉，勿失厥義，是則為善。”座中咸曰：“老氏稱：‘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明聖人意深邃無極。今傳胡義，實宜徑達。”是以自傷受譯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飾。(1984：22)

“信、達、雅”是否源於支謙則不得而知；我認為這多半是巧合，因為嚴復的三個字和支謙的三個字的用意幾乎完全相反。至於它和泰特勒 (Alexander Fraser Tytler) 的“翻譯三原則”的關係就更無從查攷了。最可靠的還是嚴復自己的解釋：

《易》曰：“修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楷模。(1984a：136)

從這裡看，“信、達、雅”三字正是來自上面的“誠、達、文”。嚴復將中國儒家傳統的“文章正軌”挪用到翻譯上來了。²這段話既符合嚴復的身分，也把“信、達、雅”三個字的涵義和用心交代得清清楚楚。

嚴復從古書上摘下了三個字，我們分析它的定義時，既要照顧到“信、達、雅”本身的字面意思，同時也要尊重嚴復本人的用意。

“信”即“誠”、“不欺”，可以解釋成不欺作者和讀者；也就是我們說的“忠實”，說的是譯者的態度和譯文的結果。這一點未見有過爭議。

“達”稍微複雜一點。“達”一般解作“通順”、“暢達”、“流暢”、“達義”。“達義”涉及到“義”，容易和“信”混淆；所以用“通順”（“暢達”、“流暢”也是“通順”的意思）

的人比較多，這也是引起後來“信”、“順”之爭的根源。說“達”是“達義”也並非一定不可，它正說明了嚴復的“達”與“義”（信）之間的關係。但既然前面已經有了一個“信”字，似乎也不必再重複“義”了。另外，把“達”解釋為“暢達”、“達義”，在邏輯上有循環定義之嫌。一般傳統文藝理論是將內容（義）與形式（句法）分開的，嚴復的“達”也主要指的是句法。“《天演論》譯例言”的第二段說：

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百言。假令仿此為譯，則恐必不可通，而刪削取徑，又恐意義有漏。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則下筆抒辭，自善互備。至原文詞理本深，難於共喻，則當前後引襯，以顯其義。凡此經營，皆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1984a：136)

他的“達”是指“通”，解釋成“通順”似無不可。但他的目的是使文詞“自善互備”，“以顯其義”；這些都是“通順”二字所不能涵蓋的。那麼，最簡明的解釋可能是“說清楚”，根據是上面說的，從“難於共喻”到“以顯其義”的經營方法。周煦良說“達就是使譯文能使人看得懂”(1984：974)；陳康認為“達”，“乃指人從譯文裡可以順利得到原文中的意義”(1984：443)也是不錯的。嚴復也是按傳統，把內容與形式分開來談的。“修辭立誠”和“辭達而已”就是兩回事。他關心的重點是原文的“義”，不是句法。所謂“信”，是意義上的忠實，至於句法，“則當前後引襯”，只要清楚就夠了。而清楚也是為了忠實。“信、達”合起來，就是把原文的意思說出來，說清楚。這樣看，“達”就不包括保留原文的風格，與泰特勒的“三原則”也沒有甚麼關係。

怎樣才能說清楚呢？對嚴復來說，就是“用漢以前字法句法”才容易做到，用“近世利俗文字”就困難（1984a：136）。這就是他說的“雅”，講的是譯文文體。既然“用漢以前字法句法”來翻譯，就更無法保留原文的風格了；相反，卻突出了古文的風格。嚴復的譯文能“與晚周諸子相上下”也證明了這一點。也正為此，“雅”字才成為歷來爭論的焦點。

可以看出，“信”是對原文的“義”而言的；“達”和“雅”指的是譯文，它們為“信”服務，也就通過“信”，與原文的“義”有間接的關係，而與原文的形式沒有任何關係。

應該指出，“《天演論》譯例言”的前三段結構不夠嚴謹，粗心的讀者容易誤會他的意思。比如上面“信、達、雅”的出處就放在了第三段，和“雅”混到了一起，很多論者也順理成章地理解成對“雅”的說明了。最容易使人誤解的是第一段：

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今是書所言，本五十年來西人新得之學，又為作者晚出之書。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僣倒附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不悞本文。題曰達旨，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什法師有云：學我者病。來者方多，幸勿以是書為口實也。（1984a：136）

這一段裡有兩層意思。前半談“信、達”的重要性，是嚴復提出來的翻譯通則。而後半“今是書所言”云云，講的是《天演論》的翻譯方法，是嚴復自己的辯白；換句話說，嚴復承認《天演論》是不夠“信”的，不要把它當做“正法”。由於他用了“僣倒附益”，“字比句次”等語，後人便以為他在說句子結構的問題，

便與“達”聯繫起來了。³實際上他還是在講“信”（或“不信”）。“附益”和“發揮”應看作是“不信”的例子，而不應是“達”的內容。這裡嚴復沒有說實話，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說《天演論》的句子結構，於內容的增刪也只用“取便發揮”一帶而過。如拿《天演論》和原文對照，就會發現他的“附益”和“發揮”，以至“刪削”都遠遠超出了“達”所容許的範圍。他自知《天演論》譯得“不信”，才告訴讀者，不要以這本書為“口實”。（後來以《天演論》為口實攻擊嚴復的人卻不勝其數。）假如他將《天演論》的翻譯方法（包括刪削）如實地講清楚，讀者就不會以為他在說“達”了。嚴復的“僣倒附益”不單指詞法句法，還指內容。這可從〈《原富》譯事例言〉得到證實：“是譯與《天演論》不同〔…〕於辭義之間無所僣倒附益。”（1984b：139）這就明顯不是句子結構，否則就要理解成《原富》是字對字的翻譯了。實際上嚴復自己對“達”的解釋是上文提到的〈《天演論》譯例言〉中的第二段，裡面明確指出“刪削取徑”是不可取的。

“信達雅”是以“信”為中心的理論，這一點已成定論。“信”這個詞在當時翻譯理論中代表了一個全新的概念。嚴復研究過佛經翻譯，這一點毋庸置疑。漢譯佛經是傳統學者研究古籍的必修課，嚴復也不例外；更何況他本人是翻譯家。古代佛經翻譯理論的核心是“文質”說，就是“直譯”和“意譯”之爭。說是“文質”說，實際上只有“質論”，而沒有“文論”，因為它兩次在佛經譯場出現，都剛一冒頭就被打下去了。其中一次在支謙的〈法句經序〉裡提到，但他很快就改變了看法（見上面引文）；另一次是道安提出的，也被說服了（1984：27）。當然在實踐上，各家譯文的“文、質”程度也不可能盡同。羅新璋把佛經翻譯理論概括為“案本”，稱嚴

復的理論為“求信”；這兩個詞歸納得非常精確、透徹。但是他又說“精神姿致依然的‘故我’，也即是趣不乖本的‘本’，也即是當包達雅的‘信’”(1984：19)；這樣又抹殺了二者的區別，辜負了嚴復的苦心。“案本”和“求信”字面上的意義很相似，但在翻譯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上，根本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理論體系。

古代佛經翻譯理論沒有“信”的說法。在討論佛經翻譯的文獻裡，“信”字只出現過一次，就是上面〈法句經序〉裡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這是“座中人”針對支謙嫌維祇難譯文不雅而搬出了老子；他們強調的是譯文不能求雅（文）。

那麼佛經翻譯的標準是甚麼呢？就是“案本”。“案本”二字出自道安的“鞞婆沙序”：“案本而傳，不令有損言游字；時改倒句，餘盡實錄”(1984：26)。“案本而傳”是“質論”的基本立場，以“樸（質）則近本”（慧皎，1992：24）為其理論依據。用隋朝的理論家彥琮的話來說就是：“寧貴樸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1984：46)古代說的“樸”與“質”，基本上是字字對應的翻譯方法。“案本”和“信”都是忠實，好像只是用詞不同而已。實際上“案本”的忠實以“質”為條件，而“信”不需要這個條件；這是二者根本的區別。古代譯論特別強調“貴本不飾”（僧佑，1995：254），認為要忠實就只有求質；“忠實”與“質”不可分，有的譯文甚至到了寧可失義也不失質的程度。其實“樸則近本”是個錯覺。這種觀念也不是中國獨有，西方也如此。我們常說的“直譯”和“意譯”，英文中就有 faithful translation（忠實翻譯）和 free translation（自由翻譯）的說法。英文中的“忠實”和“自由”，當然是指“句法”而言的，絕不會指意義。把“句法上的忠實”看成“忠實”，和中國的“案本”思想是一致的。順便

說一句，這個錯覺一直纏繞着中國翻譯界，是導致歷來“直譯”、“意譯”，“硬譯”，以及“信”、“順”爭論的根本原因。

嚴復研究佛經翻譯的收穫，是發現了質派觀點的謬誤。但“信達雅”不是與質派相對的所謂文派理論，因為那就等於說，只要譯得“文”就忠實，或要忠實就必須“文”，這同樣是錯誤的。“文”、“質”都與“本”沒有必然的關係。佛經翻譯理論始終圍繞着“文質”二字兜圈子；嚴復卻斷然跳出了“文質”的漩渦，提出了“信”的原則。“信”強調忠實於原文的“義”，不論“文質”，也就不受原文句法左右。“案本”思想是：忠實取決於句法；而嚴復則認為：句法是為了忠實。這就是漢譯佛經影響了中國語言，而讀嚴復的譯文不會受英文句法影響的原因。

再來比較一下〈法句經序〉裡的“達”和嚴復的“達”。前者是“徑達”，就是現代說的“直譯”，儘量模仿梵文句法，充分體現了“案本”精神。而嚴復卻認為，仿西文句法“必不可通”。原文句法複雜的要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詞理深刻的要“前後引觀”。與“徑達”完全相反——“曲達”。

嚴復的“雅”和〈法句經序〉的觀點的區別，更是一目了然。支謙的“雅、飾、嚴、美”四字在這裡基本同義，是“文質”說裡的“文”的意思。“‘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傳胡義，實宜徑達”這句話同樣反映了“案本”思想。“美”（或“雅”）與“信”，“美”與“徑達”互不相容，完全對立；而嚴復的“雅”（也包含“美”的意思）的目的是“達”，“達”是為了“信”。“信、達、雅”三字是遞補、統一的。〈法句經序〉就像一篇反雅的宣言；而嚴復與“美言不信，信言不美”針鋒相對，引孔子的“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名正言順地打起了“爾雅”的大旗。

從翻譯方法上看，佛經翻譯是“初從梵語，倒寫本文，次乃回之，順同此俗”（道宣，1984：48）。從一下筆就不問漢文“字法句法”是怎樣的，不以中國的“文章正軌”為“譯事楷模”；所以完全不受儒家經典的影響，創造出了一種新文體，“為我國文學界開一新天地”（梁啟超，1984：65）。嚴復的譯法可以用他的“達”字概括，不再重複了。佛經的一套翻譯方法，嚴復非常清楚。吳汝綸也提醒他說：“歐洲文字，與吾國絕殊，譯之似宜別創體制。如六朝人之譯佛書，其體全是特創。今不但不宜襲用中文，並亦不宜襲用佛書。竊謂以執事雄筆，必可自我作古。又妄意彼書固自有體制，或易其辭而仍其體，似亦可也。”（1986：1564）然而嚴復為了“達易”，選擇了現成的古文，沒有接受吳的意見。這可能是嚴復躲懶的地方。但翻譯多少種不同的語言，就要別創多少種不同的文體，實踐上似乎也很難做到。再者，創新文體談何容易，遠非一人之功所能辦得到。文、史、哲的翻譯到底應沿襲“文章正軌”還是要“顯分體制”，在中國翻譯界至今還沒有定論。（西方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理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績突出。）三十年代“信”、“順”的爭論與此有關。這場爭論自有其歷史根源，但由於過分集中於幾個口號的提法，偏離了本來的論題；結果各執一端，於理論建設無補。吳汝綸的“易其辭而仍其體”的觀點值得參考。譯文體相對於文章體，要儘量做到存大異，求小同。

嚴復在政治上尊天演、斥革命，但從“文質”說到“信达雅”說，卻不是一個自然漸進的過程，而是一個飛躍，是翻譯史上的一次革命。他徹底推翻了“樸則近本”的觀點，把譯者從字字對譯的桎梏中解放了出來。這是“信达雅”說的最大功勳，足使嚴復在中國現代翻譯理論史上佔第一位而當之無愧。

下面討論一下爭議最多的“雅”字。

現代翻譯理論重視原文類型，譯者意圖和讀者。⁴於第一點，原文類型，嚴復的理論並不區分；這是他的局限。從他翻譯的著作來看，也都屬於“文、史、哲”這一大類。中國翻譯理論一向注重通則，而研究原文性質與翻譯方法的關係的“細則”文章很少；不過在中國，歷來談翻譯都是指廣義的文學翻譯，即包括史、哲，今天仍然如此。⁵第二點，譯者意圖，嚴復在他譯作的前言裡都談到了一些。討論嚴復譯著的目的和影響的文字很多，隨便翻開一本嚴復傳記都能找到。但是譯者意圖和翻譯策略的關係，嚴復沒有論到；或可以說，他根本沒有想到過這個問題。

但他的讀者是誰，嚴復心中確實有數；而且他心目中的讀者與他的“雅”也有關係。倒是後來批評他的“雅”的人，偷換了他的讀者，他當然不服氣。再後來的批評乃至破口大罵，他也聽不到了。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裡，讀者問題講得很少。他見到對“雅”的不同意見之後，⁶進一步解釋了“雅”的原因，同時也補充說明了讀者問題。他說：“其所勞苦而僅得者，徒文辭耳，而又不知所以變化。”（1984c：140）就是說淺顯的文字，自己寫不來；這既是謙詞，又像藉口，也是實情。傳達中國從來沒有過的西學新知，他只能用自己駕輕就熟的文體才最有把握，所謂“為達易”。魯迅在三十年代仍覺得白話（俗文字）不夠用（1984：276），何況比他早三十多年的嚴復呢。嚴復又說：“不佞之所從事者，學理邃曠之書也，非以饗學童而望其受益也。吾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國之古書，而稗販吾譯者，此其過在讀者，而譯者不任受責也。”（1984c：141）嚴復心目中的讀者自然是當時的知識分子。儘管他的譯文典雅，他的讀者還是看得明白的，否則

嚴譯作品不會有那麼大的影響。《天演論》發表了三十年以後，賀麟還說：“嚴譯雖非今日普通人所易解，但能使舊文人看明了。”(1984：153)退一步說，“文無難易惟其是”(嚴復 1984c：141)，韓愈的話也使他心安理得。

嚴復和批評他的人辯論之後，在“《群己權界論》譯凡例”裡，事先聲明：“海內讀吾譯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艱深，不知原書之難，且實過之，理本奧衍，與不佞文字固無涉也。”(1984c：144)這絕不是推脫責任。嚴復所譯的書，原文辭旨本深，即使是今天的白話譯本，也不是“學童”所能輕易讀懂的。此外，他在〈《天演論》譯例言〉裡，還提出了一個文字難易與讀者專業知識的相對性問題：“又原書論說，多本名數格致及一切疇人之學，倘於之數者向未問津，雖作者同國之人，言語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譯也耶？”(1984a：137)如果原文的外行讀者不能完全讀懂原文，那麼怎能指望當時全是外行的中國讀者一看譯文就明白呢？他巧妙地用“等效”理論，論證了對兩國讀者而言，譯文的“雅”與原文的“深”是對應的。林紓和嚴復同用古文做翻譯，但“林譯小說”就比“嚴譯名著”易懂的多。所以討論文字的難易、雅俗，也不能脫離讀者與原文性質。

上面嚴復為自己的辯白，站在他的立場上看，都合乎情理，邏輯上也講得通。嚴復之所以堅持一個“雅”字，還有一層原因，那就是他個人的審美觀點。他瞧不起“利俗文字”：“苟然為之，言龐意纖，使其文之行於時，若蜉蝣旦暮之已化，此報館之文章，亦大雅之所諉也。故曰：聲之眇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回於庸夫之聽。”(1984c：141)可見俗文字他不但不能為，而且以他的身分也不屑為。譯者（尤其是優

秀的譯者）個人的好惡是很難用“客觀”的尺度統一的。

有人認為“雅”是多餘的（鄭振鐸，1935：5），其實不然。任何作者或譯者在任何時代，都要面對文體雅俗的選擇。宋朝贊寧論翻譯文體時，也談到雅俗問題。他主張譯文要雅，即用書面語，不用口語(1987：55-56)。嚴復“審擇於斯二者（“漢以前字法句法”和“近俗之辭”——即雅、俗）之間，夫故有所不得已也。”(1984：136)嚴復不能缺少“雅”，就如瞿秋白不能放棄“白話”一樣重要(1984a：265-273；1984b：279-88)。不同的是，嚴復認為“雅”容易“信”，瞿秋白堅持只有“俗”才能“信”。這就明顯看出，他們心目中的讀者絕不是同一類人。今天辯論二者孰是孰非，沒有太大的必要，因為這裡有“時差”。就是今天的白話，也仍然有口語和書面語，“報館文章”和“學院式文章”的分別。嚴復生不逢時。早二十年，他的桐城古文便可以堂堂正正地通過讀者這一關；遲二十年，他大概也不會堅持一個“雅”字。後人的批評有點強古人之所難。瞿秋白更極端，連魯迅的《毀滅》他都嫌“白”得不夠(1984a：268)。他對嚴復的批評，政治上的譴責實多於學術上的探討。

上文提到，嚴復的“信”是對譯者的態度和譯文結果的要求；“達”即翻譯時使用的手段；“雅”指譯文的文體。對於中國傳統理論來說，三個字足夠了。從現代學術的角度來看，“信、達、雅”三個字中，最經得起推敲，涵義最明確的是爭議最大的“雅”字：“漢以前字法句法”。如果嚴復沿用古代的“文”而不加規範，反倒又含糊了，因為它缺乏具體內容。“達”是方法，雖然不及現代學者歸納得詳細、具體（如：張培基等，1980），但讀者能明白是指句法。問題最大的倒是“沒有爭議”的“信”字。

“信”包括甚麼，嚴復沒有解釋，後人也很少問。這是傳統理論和理論家的先天缺陷。從本文上面的分析來看，他的意思是忠實於原文的“意義”，而他的“意義”不包括形式。這本身就有很大問題：形式有沒有意義？唐人說：“只要能信，就一定能順。”（1984：524）錢鍾書也指出：“未有不達而能信者。”（1984：23）此二人的“信”就包含形式。但是即使是不包括形式的“意義”，也失之於空泛，如：是字義還是句義？字面意義還是象徵意義？表層意義還是隱含意義？語言意義還是文化意義？忠實於作者、讀者，還是忠於譯者自己的翻譯目的？等等。隨着翻譯範圍的擴大，或類型、題材的增加（如：法律、商業、科技、外交等），譯者的主動性就越來越大（也可以說越來越小）；各種類型翻譯的功能不同，譯者目的和原作者的寫作意圖不一定完全吻合，“信”的定義和內容也就越趨複雜。

一百年來，中國翻譯界對嚴復的“三字經”，始終抱有一種矛盾的心理，既不能完全接受，又不忍全部放棄。於是，各個時代根據不同的需要和個人見解，或將它改頭換面，或重加界定。於是出現了“忠實、通順、美”（林語堂，1984：417-432），“正確、通順、易懂”（范存忠，1984：778-782），“信、達、貼”（思果，1994，18），“信、達、切”（劉重德，1984：816-827）等，不一而足。仍沿用“信達雅”三字而改嚴復原意的說法更多，但都大同小異，不一一列舉了。從現代學術的觀點來看，這些原則和標準是否具體可行呢？“忠實”和“正確”哪裡不同？“貼”與“切”有甚麼區別？“信”與“切”是否重複？這些“新三字經”表面上增加了新意（應該說部分改換了原意，而沒有“增”），傳統理論的思維方式和弊病還在；實際仍在原地踏步，沒有實質的

發展。

要問“信”包含甚麼內容，是現代理論和傳統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不同程度上發展了嚴復的理論的是林語堂，朱光潛和趙元任。

林語堂的“忠實、通順、美”（1984：420-422），沒有徹底擺脫嚴復（或傳統理論）的影響。但是他否定了“直譯”、“意譯”兩個字的流弊，而代之以“字譯”、“句譯”。這可能是中國翻譯理論最早涉及到“翻譯單位”（unit of translation）的說法。他對“句譯”的解釋很像嚴復的“達”，但嚴復的理論沒有“翻譯單位”。今天看“句譯”的方法雖不完善，對傳統理論而言，卻無疑是進步的。遺憾的是後人沒有繼續探討下去。

朱光潛認為“信”最不容易辦到，原因是字義很難掌握。他把字義分為四種重要的意義：“直指的或字典的意義”（indicative or dictionary meaning），“上下文決定的意義”（contextual meaning），“聯想的意義”（associative meaning）和“聲音”的意義；此外還有兩種次要意義：“歷史沿革的意義”（historical meaning）和“習慣語的意義”（idiomatic meaning）（1984：448-452）。他似乎主要是談原文語義的層次，沒有論及翻譯的方法、原則。另外，朱光潛也主張“‘直譯’和‘意譯’的分別根本不應存在。”（1984：454）

趙元任的文章〈論翻譯中信、達、雅的信的幅度〉，討論的是“信”的內容。趙文與“信達雅”沒有多大關係，他是借“信達雅”的題目講開去，闡釋幾種翻譯方法：“意義跟功用上的幅度”，“直譯與意譯的幅度”，“見次的頻率”（即後來紐馬克說的 frequency rule），“借譯詞”（calque），“岔枝借譯”（“skewed” translation borrowing），“借來的結構”，“詞品”（word class），文

體對應，成語對應和使用場合對應等。其中有的觀念或來自卡特福德 (Catford) 的理論（如：“借譯詞”、“借來的結構”、“詞品”等）（1984：726-741）。他談的“直譯與意譯的幅度”也和“翻譯單位”（他稱之為翻譯“顆粒”）有關。這是一篇典型的語言學派的翻譯理論，重描述不重規範，是中國翻譯理論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里程碑。

以上我們分別從嚴復的立場，傳統翻譯理論和現代翻譯理論的角度討論了“信達雅”的意義。這三個字曾經是“譯書者的惟一指南，評衡譯文者的惟一標準”（陳西滢：1984：401）。任何一種翻譯理論，只要對譯者有指導意義，就一定能當作評者的標準；反過來說，能作標準的也就有指導作用。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看出，無論“信”或“忠實”，都缺乏具體的內容和對象（即忠實於誰）。所以，不問原文、譯者、讀者、以至翻譯功能、場合，空談一個“信”字，並沒有多少指導意義，也就無所謂標準。

再看看朱光潛和趙元任的論述。前者分析了意義的若干層面，後者也總結出翻譯有多種手段；這些都是傳統理論家沒有論到，也不關心的東西。如果和現代功能主義理論比較，“信”更顯得空洞。功能理論甚至認為，有的譯文是不要“信”的。趙元任就舉了一個“信的程度等於零”的例子：一次飛機發生故障，準備緊急降落，機師通知乘客做好準備。他先用法文和德文把情況說了一遍，等他要說英文的時候，故障排除了。於是他用英文說：沒事了。（1984：740）這個“翻譯”正符合功能主義理論的要求，而傳統理論卻無法解釋，或根本不承認這是翻譯。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香港學者周兆祥和張南峰對“信達雅”的批判。周兆祥從功能主義角度論證了“信達雅”標準的局限性，指

出“信達雅（如果可以清清楚楚界說的話）不妨拿來做某些翻譯工作（例如古典小說今譯）的標準，但作為所有翻譯工作的總原則、大方向，不能成立。”（1986：48）而不能“清清楚楚界說”正是傳統理論的致命弱點。張南峰從整體上否定了中國“以忠實為目標的應用翻譯理論”。張文主張翻譯研究不宜只強調譯文的“忠實”而忽視（或漠視）文化傳統、意識形態、權力關係等因素對翻譯的影響，並指出，現代的“非規範性的翻譯理論也有間接應用價值”（1988：29-41）。

嚴復的理論既沒有“清清楚楚界說”，又只強調“忠實”而不及其餘，於今天的翻譯實踐已經沒有甚麼意義了。我們這樣說並是否認嚴復對翻譯理論的貢獻。“信達雅”理論是近代中國翻譯思想的結晶，蘊涵着一代譯學大師的辛勤勞動。它在歷史上的不朽地位是抹殺不掉的。可是今天，它只有歷史價值，在學術上，“信達雅”只應屬於翻譯理論史研究的課題。

註釋

- ¹ 泰特勒的“三原則”是：1. 譯文要完全寫出原作的思想；2. 風格和寫作方式要與原文特點一致；3. 譯文要和原文一樣流暢。
- ² 這一點很多學者都提到過；如：殷興（1984：606）、劉靖之（1984：852）等。
- ³ 如羅新璋（1984：5）。
- ⁴ “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學派主張全盤考慮文化、社會、政治、歷史等因素。它屬於“描述”性的（descriptive）理論，與嚴復“規範性”的（prescriptive）原則不同，暫不討論。
- ⁵ 殷興根據蘇聯語言學家巴爾胡達羅夫的分析，曾將原文分為三大類：1. 新聞報導、文件和專門科學著作；2. 政論作品；3. 文藝作品，並簡要論述了相應的翻譯原則。他說：“翻譯準確性的標準是以翻譯的目的，

原文的性質及譯文的讀者為轉移的。”(1984: 610-611)這不但在五十年代非常難得，而且今天仍很少見。

6 指梁啟超在〈紹介新著《原富》〉裏對嚴復文字的批評(1990: 266-268)。

參考書目

- 陳康(1984)。〈論信達雅與哲學著作的翻譯〉，《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443-446。
- 陳西滢(1984)。〈論翻譯〉，《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400-408。
- 道安(1984)。〈鞞婆沙序〉，《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26。
- 道宣(1984)。〈唐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之余〉，《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48。
- 殿興(1984)。〈信達雅與翻譯準確性的標準〉，《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605-612。
- 范存忠(1984)。〈漫談翻譯〉，《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778-792。
- 慧皎(1992)。《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
- 梁啟超(1984)。〈翻譯文學與佛典〉，《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52-67。
- (1990)。〈紹介新著《原富》〉，《嚴復研究資料》，牛仰山、孫鴻霓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66-268。
- 林語堂(1984)。〈論翻譯〉，《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417-432。
- 劉靖之(1984)。〈重神似不重形似〉，《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1-15。
- 劉重德(1984)。〈試論翻譯的原則〉，《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816-827。
- 羅新璋(1984)。〈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1-19。
- 錢鍾書(1984)。〈論譯事三難〉，《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23。

- 瞿秋白(1984a)。〈魯迅和瞿秋白關於翻譯的通信〉，《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265-273。
- (1984b)。〈再論翻譯〉，《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279-288。
- 僧佑(1995)。《出三藏記集》。北京：中華書局。
- 思果(1972)。《翻譯研究》。香港：友聯出版社。
- 唐人(1984)。〈翻譯是藝術〉，《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522-526。
- 吳汝綸(1986)。〈吳汝綸致嚴復書—1899, 4, 3〉，《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頁1564。
- 徐永煥(1984)。〈論翻譯的矛盾統一〉，《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678-693。
- 嚴復(1984a)。《天演論》譯例言，《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136-138。
- (1984b)。《《原富》譯事例言》，《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138-139。
- (1984c)。〈與梁任公論所譯《原富》書〉，《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140-142。
- (1984d)。《《名學淺說》譯者自序》，《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145-146。
- (1984e)。《《群己權界論》譯凡例》，《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142-145。
- 彥琮(1984)。〈辨正論〉，《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44-47。
- 贊寧(1987)。《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
- 張南峰(1998)。〈以“忠實”為目標的應用翻譯學〉，《翻譯學報》2，頁29-41。
- 張培基等(1980)。《英漢翻譯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
- 趙元任(1984)。〈論翻譯中信、達、雅的信的幅度〉，《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726-741。
- 鄭振鐸(1994)。〈世界文庫編例〉，《世界文庫》。上海：文藝出版社，頁4-6。

- 支謙 (1984)。〈法句經序〉，《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22。
- 周煦良 (1984)。〈翻譯三論〉，《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972-986。
- 周兆祥 (1986)。〈翻譯的準則與目標〉，《中國翻譯》3，頁 46-50。
- 朱光潛 (1984)。〈論翻譯〉，《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447-455。

舊題新解： 從國際互動看中國翻譯*

朱純深

一、引言

一九九六年初，在澳大利亞的 Deakin 大學舉行的翻譯研究研討會上，與會者提出的問題中，有一個是：是否可能將中國人對翻譯研究的成果翻譯成英語，讓不懂漢語的人也能瞭解？

這個問題，體現了外國學者對中國學者的翻譯研究懷有積極的、感興趣的態度。這種態度，可以從 R·阿埃瑟朗的慨嘆和希望中得到進一步印證：“由於受語言的限制，〔…〕中國譯論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可我們知之甚少。〔…〕以後如有好的文章，希望能用英語或法語向我們推薦”（見許鈞 1996：2，8）。在這方面，中國學者也不負眾望，近年來除了散見於國際性學報上的論文外，更編輯出版了關於漢語／中國翻譯研究的專號 (Wang and Xu (eds.) 1996; Xu and Wang (eds.) 1999)。相信隨着這個勢頭，將來中國的學者會同國際譯學界進行更廣泛、更深入的學術交流和互動。

當然，這種互動只是還處在初始階段。在中國翻譯界，更有一股很強的思潮，認為中國翻譯一是自成體系，二是要發展其“特色”。關於這一點，筆者將另文分析，指出中國翻譯理論從歷史發展看可以說是成體系的，但不好認為“自”成體系，而從將來發展看，中國翻譯的理論個性，更要通過與世界譯學大系的互動得到

砥礪彰顯。這篇文章只希望從中國譯學體系與世界譯學大系的互動這個角度，談談以新的視點探討若干舊問題的可行性。這些問題是：理論研究、信達雅以及有關翻譯的藝術／科學定性。

二、翻譯要不要理論

應該說，關於翻譯要不要理論的爭論，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並非中國翻譯所特有 (Zhu 1998)，因此對理論的適用性研究，足以成為中國譯學同世界譯學界建立互動的一個界面。其實，提出這個問題隱含了另外一個更需要人們直面以對的問題：

翻譯要不要研究？

相信無論是承認還是否認翻譯需要理論的人，都無法否認翻譯作為一個心智的、語言的、文化的或藝術的現象，是一個有意義的研究對象吧。具體到中國翻譯，如果中國的學者自己不進行第一手的高水平研究，遲早也會被納入別人的研究範圍，成為第二手的研究對象的。^[1]

既然翻譯需要研究，那接下來的問題是：

研究要不要理論？

如果承認基本理論研究可以作為旨在改進實際操作質量的應用理論的哲學依托，為後者提供持續性發展的動力和方向，那翻譯實踐就不好一味拒絕同理論的互動了。

中國一位著名籃球運動員說過，早先，他“對籃球的認識只停留在很膚淺的程度。覺得只要有好的身體條件，再加上苦練就可以

打籃球。而根本沒有掌握到其真正的內涵。”在美國猶他大學的兩年學習使他得以從高層次，即理論的、學術的層次上總結概括，把籃球看作“一種思維運動”。^[2]

比之籃球運動，翻譯，或翻譯研究，應該說同樣是一種思維活動，並非單靠直覺層面上好的文字功力再加上苦練就可以達到高層次高效率的運作的。有人作為翻譯者，聲稱自己翻譯不靠理論，然而作為學者或大學教授，又在發表有關翻譯批評或（應用）研究的論著。這樣做，本身就在實踐着一種理論^[3]與實踐割裂的傾向。正是這種傾向，導致了勞隴 (1996：41) 所稱的“大量〔的〕盲目實踐”和“〔不斷產生的〕空洞的理論”，以及吳義誠 (1997：5) 指出的基於價值判斷甚至情緒化的低層次和感想式的翻譯批評。如果我們同意翻譯現象需要研究，而研究需要理論，那麼：

研究需要甚麼樣的理論？

這就涉及到理論的分類問題了。如果按研究的側重點分類，那根據 Holmes (1988: 71ff) 的體系，翻譯研究首先可分為純翻譯研究和應用翻譯研究；前者可以進一步分為描寫研究和理論研究。描寫研究以產品、功能或過程為重點對象，理論研究又可分為超文化語言的通用理論和受到媒介、地域（而非國家，見下文分析）、級階、文本類型、時代以及具體翻譯問題所限定的“局部理論”。

就理論的性質而言，從反面說，至少有三種所謂的“理論”應該排除在外 (Zhu 1998)。其一為“閉門造車”式的理論；這種理論的特點為缺乏經驗與實驗證據以及由文獻佐證的與整個翻譯研究知識大系之間的聯繫。其二為所謂“權威”（不一定是學術權威）的論斷性意見。其三為所謂的“天真的經驗主義”，即“‘Naive

empiricism' of the pedagogues and translators who sometimes 'proceed simply from entirely subjective descriptions' of 'what has worked for them'” (Neubert and Shreve 1992: 33)。

然而，在目前的中國譯學研究中，影響最普遍的是將理論按國別分類，最常見的就體現在“中國理論”與“外國（或西方）理論”的二分法認識模式上。因此，在討論各種理論的互動時，先必須對“中國的…”和“外國（西方）的…”這兩個定語的語義範圍作出界定。

“中國翻譯”析

首先，“中國（的）”，作為一個地緣與政治概念上的國家，其定義成分主要包含了“主權”、“國界”、“政府”等，因此在譯入英語時，傾向於用 China's 或 in China 等說法；而作為一個人類學概念上的民族，其定義成分則更突出包含了“血統”、“文化”、“語言”等因素，在譯入英語時，傾向於用 Chinese 一詞。

所謂中國翻譯（研究），邏輯上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幾個類別：

- 1) 以地緣國界定義：任何人在中國境內從事的有關任何語言間的翻譯實踐與研究；
- 2) 以國籍定義：任何中國籍的學者在任何時期任何地方從事的基於任何語言（包括漢語及中國少數民族語言）之間的翻譯實踐與研究；
- 3) 以血統定義：任何具有中華（漢族及中國少數民族）血統的學者在任何時期任何地方從事的基於任何語言之間的翻譯實踐與研究；
- 4) 以語言定義：任何國籍任何血統的學者在任何時期任何地方從事的基於漢語同中國少數民族語言之間以及前述任何（一種）語言與其他語言之間的翻譯實踐與研究。

如果中國翻譯可以由這四個類別構成的話，那麼一方面就不存

在某個時期或某個輩分的具有中國國籍或血統的學者從事的翻譯實踐或研究才是屬於中國的或具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研究）這一說。另一方面，“中國翻譯”一語，本身在翻譯成（比如說）英語時，就因為其多義性而存在着概念和技術上的困難。如果其指涉範圍為（地緣或政治概念上的）中國境內進行的翻譯及翻譯研究時，那“中國翻譯”就應該是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事實上，在未加嚴格定義情況下使用“中國翻譯”時，在下意識的定義中可能同時包含了國界、國籍、血統、語言等上述四個界定因素，形成一個非常狹隘（但並非精確）的定義。實際使用中通常也用來指稱地緣概念的中國境內的主流譯學，即中國大陸學者從事的基於漢語的翻譯實踐與研究。比如 Xu and Wang (eds.) 1999 的 *Meta*《中國翻譯研究專號》，所收論文均為中國大陸境內學者的研究成果，其英語翻譯便為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in China*，法語為 *Théorie et pratique de la traduction en Chine*。

但是，去掉國界、國籍、血統等與翻譯學術無直接關係的界定因素後，以語言定義的廣義的“中國翻譯”，其外延所及，可以包括 1) 有中國國籍或血統的學者在世界各地所進行的翻譯實踐及研究，所涉及語言包括漢語（及中國其他民族的語言），地理範圍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以及澳門；或者甚至更廣，包括 2) 任何人、在世界任何地方、在歷史上任何時期，所從事的譯入或譯出漢語及中國其他語言的翻譯以及與此相關的研究。對於這一廣義的“中國翻譯”，通常可譯為 Chinese Translation。比如 Wang and Xu (eds.) 1996 的 *Perspectives* 專號，所收論文包括華裔美籍與英籍學者的論文，就稱為 *Special Issue: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4] 廣義的“中國翻譯”實際上也不宜用 Translation in China 一說

的。為求學術上的嚴密與包容，對以中文與其他語言文化體系之間的翻譯為研究對象或實驗領域的翻譯，在必要時似乎可以用 Chinese-related Translation 這一提法，漢譯可為“中文翻譯”，其中 Chinese 和“中文”均指中華民族的文化、文學、文字等構成民族性的內涵。

如果沒有特別說明，本文在討論狹義的“中國翻譯”時，用“中國翻譯”一語，指的是在（至少目前）中國大陸所進行的翻譯研究；用“中文翻譯”一語，指的則是廣義的“中國翻譯”。

“外國／西方理論”析

與中國大陸翻譯界潛意識裏採用的狹義的“中國翻譯”概念相對的，是一個所謂的“外國／西方翻譯（理論）”的概念。而每當強調“中國翻譯”的“自成體系”時，這一對概念便在論者的下意識裏從相對變成了相對立的兩個體系。如譚載喜（1998：12）所稱：

羅新璋先生在《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一文中認為：“我國的翻譯理論自有特色，在世界譯壇獨樹一幟”。這一結論無疑是十分正確的。但作出這一結論似乎已經隱含一個前提，即中國的翻譯理論之所以“自有特色”，“獨樹一幟”，是因為“世界譯壇”上尚有其他同樣“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存在。

然而可惜的是，很少有人進一步探究這些“其他體系”是甚麼，（根據國別或語別）又可以有多少？比如譚文非常正確及時的提出了對比的必要性，可是文中提出了對比的似乎又只有兩個體系：一個是“中國”的體系，另一個是世界各國各語聯合而成的“西方”體系，認為這兩個“是世界譯壇兩大舉足輕重的譯論體

系”（頁16），翻譯學要“在中西譯論兩個體系之間進行比較”（頁13）。於是乎，這些本來同“中國翻譯”體系平等的“其他系統”，在概念上又淪為一個模糊的單數集合體。

從歷史上看，這種普遍存在的集體無意識的認知模式，因襲了近現代中國把“西方”看成鐵板一塊的這一傳統的、不切合實際的觀念；^[5] 與此同時，又把自己看成一個自成或自足的體系，結果便是簡單化地描繪出一幅中國與世界相對或對立的令人不可思議的圖景。加之“特色派”對中國千年譯學思想被“西學派”拋棄的擔心（張南峰 1998：6，另見下文討論），隱隱約約的便透出一種自我孤立導致的憂患心態。

上述對於着眼點各異的各種翻譯理論的簡單化認識加上社會歷史等其他因素，長期以來影響了中國大陸各種翻譯理論與國外各種理論的互動。許鈞（1997：6）指出：“我們對國外的譯論瞭解和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太片面了。平心而論，那些排斥西方譯論的人們到底讀過多少西方譯論，有過多少研究？”據我所知，還沒有誰正面反駁過這個評論。理論認識上的片面性導致了觀念上的模糊性和研究行為的極端性，而這極端性因為漢語修辭的誇張習慣和譯學研究學術話語中的情感介入，又顯得格外突出，以至形成一種假象，有人要寸土不讓地保住千年譯學傳統，有人又要“全盤西化”。當假象被當成真相來觀照時，便出現了兩個陣營——“特色派”與“西學派”（張南峰，見上文）——之間的爭論，而如何下功夫批判性地鑽研當前世界上的各種翻譯理論，並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個領域，卻乏人問津。結果是，在沒有共同前提、缺乏共同基礎的情況下爭來爭去的話題（而非課題）成了：

“外國”理論適用於中國翻譯研究嗎？

必須指出，這種一言以蔽之的提問方式反映的照樣是一種簡單化的思維模式，任何是與否的回答也同樣是簡單化的。試問，如果無心、不肯或者不懂得如何在哲學層面上進行思考，如何在觀念和方法論上取得突破，而只是停留在表層的術語借用（參見許鈞 1997：4），不求甚解，那多麼嚴密的理論，不管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也是派不上用場的。

如果這就是中國譯界的所謂“西學派”作為的話，也就難怪那些一時尚未同其他非中國理論接觸的人對外來理論產生懷疑甚至反感了。更別說其中可能有孫喆（1998：3）所稱的“一個十分重要的主觀因素〔…〕：人們在建立各自的理論體系時，似乎都排斥他人成功的理論，因而多年來理論研究似乎陷入了無休止的“科學”“藝術”，非此即彼的極端論的爭論中。”^[6]

這種狀況，也許部分地解釋了勞隴（1996：41）所描繪的中國譯學界當前情景：“今天我們翻譯界的實際情況是：一方面大量進行**盲目的實踐**，另一方面則不斷制造**空洞的理論**。”〔黑體為原文所有〕這些所謂“空洞的理論”，應該不是指“純理論”或基本理論，而是指那些與大知識體系割裂的、沒有論證思辨也沒有實驗證據證明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不應該讓“特色”和“自成體系”論被推至極端而成為某些“自說自話”式“理論”的理據。而這些理論，或許就是目前充斥“我們翻譯界”的所謂“空洞的理論”。

因此，在譯學研究中，最重要的，最需要我們花力氣的，不是去進行翻譯要不要理論或外國理論適不適合中國翻譯這些停留於表面的爭論，而是通過認真深入的思考，嚴密的實驗之後，提出證據

來，進行深層次的探索，客觀地論證出各種理論對翻譯研究進而翻譯實踐的適用（或不適用）範圍，通過研究取向互為照應、研究重點互為補充的各種理論的互動，不斷完善各自的理論體系，提高其可操作性、互補性，為整個譯學大系的發展作出貢獻。從以下對“信達雅”以及翻譯定性的討論，可以進一步看到中國翻譯與國際譯學大系互動的重要性。

三、重提“信達雅”

嚴復當年提出的“信達雅”翻譯三原則，可說是中國譯學體系的重要支柱之一。有關其歷史淵源、定義及各原則的適用性，在中國已經爭論或討論了近一個世紀。

有關“信達雅”的討論，主要圍繞着兩個方面。其一是以“正本清源”為目的的考證，探討其來源是西方還是本土，並有論者認為，弄清這個問題“對於我們今天建設譯論的方向是有着現實意義的”（趙秀明，1996：36）。雖然具體的現實意義包括哪些還有待進一步澄清，但對這三原則以及歷史上其他類似提法的比較考證，對中國譯學歷史的研究很明顯是有意義的。只是確定了“信達雅”這一組原則是否由嚴復首創，還是源自佛經翻譯，還是受泰特勒三原則啟發，對決定中國譯學今後總體發展的方向有甚麼影響，仍令人覺得有點不得要領。其實嚴復作為一個現象本身，對現代中國翻譯學者的激勵，應該說是遠勝過考證出“信達雅”的來歷。嚴復的中學根底西學造詣深厚，向來為中國知識界所稱道，這才是中國翻譯界理論家和實踐家應該致力的方向。

當然嚴復提出“信達雅”，沿襲的是項退結所稱的中國思想家

喜用格言而非論證來表現思想的傳統（見孫蓀主編 1992：488），言簡意賅有餘而定義論證不足，也得為後人這場延綿百年的考證和論爭負點責任。嚴復本人當時並未明確以文字記下其“信達雅”產生的歷史根源（關於嚴復本人稱此說源自西方的間接記載可參見羅新璋 1991：159），別人隔着時空替他考證（可又“死無對證”），雖有意義，也總讓人覺得有點隔靴搔癢，而如果認為這能對中國譯學產生甚麼方向性的影響，則走得有點太遠了。嚴復作為一個文化載體，並非前無古人，嚴復的“信達雅”，也非“橫空出世”。他在自己學術發展的那個特定階段，為自己提出這三項原則，其認識應該是出自他的中學西學背景與對當時翻譯情勢的嚴肅思考，其表述方式也是同他本人的行文理念分不開的。至於說嚴復前後，古今中外，出現過類似提法，其意義與其說是要我們（在歷史研究領域之外）考證出誰先誰後，不如說是去發現有關的提法如此相似，是否說明了各類翻譯現象的某種本體共性，以及能否在多學科高度發展的今天以新的角度作出分析並提出新的見解。這也許才對中國譯論發展的方向有着更現實的意義。

有關“信達雅”討論的第二個焦點是三原則之間的關係。在中國譯學界，似乎一向有個揚（或者存）“信”抑“達”貶“雅”的傾向（見羅新璋 1983/84，吳存民 1997 中的有關論述），其影響所及，大大削弱了對“達”與“雅”的研究。當然，在當代對文本功能、語言哲學、信息交際的研究學科興起之前，這種只要“信”而不要“達”與“雅”的觀念是受其歷史局限的。比如說忽略了“達”，那“信”所關注的主要是信息發出者與文本形成之間的關係，而忽略了信息接受者在文本交際中的地位和作用。這從習慣上都把“達”英譯為 expressive(ness) 可以看出來。這個譯文顯示了

對“達”的解讀囿於信息發出者（作者、譯者）借助文本的“表達”，看得出傳統的詩文“言志”“載道”說的痕跡。如果借助現代對交際過程研究的發現來作進一步的探索，那麼視野所及，既考慮到表達，又考慮到包含信息接受者在內的文本信息的“傳達”與“接受”，“達”的英譯就可以是 accessible/accessibility 了。

百年來，“信達雅”之所以從者甚眾，駁而不倒，一個至關重要而又尚未引起全面重視的原因，是這三原則從翻譯的角度概括了語言功能、文本形成、人際信息交流的三個根本方面。雖然歷史的局限使嚴復無法對此進行深入的探討，但如果以現代語言學觀之，則可以看到這三個原則可以分別從 Halliday 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和 Austin 的言語行為理論中找到注解：

[...]Yan Fu (1853-1921), [...]without the sophisticated apparatus provided by modern linguistics, has notably touched upon the nature of text formation in translation, namely, to be ideationally faithful, interpersonally accessible, and textually elegant. (From the viewpoint of speech acts, it can be understood that Yan Fu's maxim was meant in theory to make his translations more appealing, persuasive and acceptable to the classically educated mandarin officialdom and intelligentsia at the time, a plausible perlocutionary attempt of this exponent of the Western new thinking.) It is interesting, anyway, to see that after nearly a century, this oriental intuitive insight finds support in the western analytic tradition. (Zhu, 1996: 345)

以上只是個沒有展開的觀察，在此提及，無非是希望說明，只要擴大研究視野，“信達雅”這筆遺產，仍然能為中國譯學走向世界，參與其他（翻譯）理論體系的互動提供一個可取的界面。

四、翻譯是科學還是藝術？

這是現代中國譯學中另外一個曠日持久的爭論，焦點在於對翻譯的定性，即翻譯到底是藝術還是科學。

縱觀中國譯學深層的思維定勢和研究取向，我們常常會發現存在一種傾向，那就是對微觀概念和術語的可操作性界定可以任其含糊，對宏觀的名分確立則耿耿於懷，名不正則言不順。然而在定義模糊的情況下，往往證而難明，產生的“熱遠多於光”。結果是，一邊放着“如何發展既切合自身特點，又能與國際接軌、易為外界理解與接受的一整套譯學術語”（譚載喜 1998：16）這樣的當務之急乏人問津，一邊又“在〔有〕些名詞稱謂上過於爭論不休，如：何謂翻譯？科學也？藝術也？技術也？”（孫喆 1998：3）。

持續了近五十年的這場爭論，並非產生於中國譯學“體系”內部。早在五十年代，前蘇聯便出現了“科學派”與“藝術派”之爭（阿埃瑟朗，見許鈞 1996：4），而中國當時在引進蘇聯的翻譯理論的同時，也“引進”了這個爭論（郭建中 1999：56）。從某個角度看，這也證明了中國譯學是無法自外於其他譯學體系的。對於中國譯學，在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中，有幾個與互動有關的問題值得反思。其一為當初拾起這個爭論之後，在多大程度上跟蹤了這個爭論在前蘇聯譯學界的發展，看看他們爭出了甚麼結果，而我們又爭出了甚麼結果可與之互動？其二是五十年代以後，特別是 Nida (1964) 之後，國際譯學界也出現了類似的討論，中國譯學界又是如何與之互動的（參見吳義誠 1997：3-4）？老實說，作為一場延續了近五十年的辯論，這一類的互動是遠遠不夠的。

缺少體系間和觀點間的建設性及批判性互動，便有可能導致視

野的狹隘和方法上的偏頗，中外皆是（見許鈞 1997：5）。於是便出現了一種現象：許多論者在談到這個問題時，多是給出意見 (opinions) 或是重複自己一方的觀點，很少分析甚至觸及對方的觀點，在“自說自話”的情況下很難形成有實質內容的辯論和論證，也很難達到客觀的共識。比如許淵沖的話（轉引自許鈞 1997：5），就是一種典型的意見：“我認為翻譯是藝術[...]我要用藝術方法來解決翻譯問題”。往細裏推敲，這句話的關鍵在於情態動詞“要”：它是要表示一個態度、意願、打算呢，是要作出某種表率或表白，或是還隱含一種“執着”——不管你怎麼說，我都要這樣做？缺乏或者不看實證、論證，停留在主觀意見層面的各執一詞，這一類的‘Naive empiricism’，如果與權威或權力，或者單純人數方面的優勢結合，便可能給辯論帶來非客觀、非學術的因素。就當前情勢看，如許鈞 (1997：5) 所說，目前譯論研究值得注意的三個傾向之一是“翻譯文藝學派對語言學派的絕對排斥”。

其實，翻譯作為一種複雜的現象，其研究的切入點和視點 (approaches and perspectives) 不止是藝術和（語言）科學。對翻譯的研究，關鍵不是先確定“名（分）”即翻譯是藝術還是科學，才能進行研究。為了讓翻譯能從整體上受益，是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從兩個（或更多的）角度出發進行探討的。^[7] 這當中根本就不存在一“派”絕對的、永遠的駁倒另一“派”的可能性，或者統一思想後才能進行探討的必要性。在這一點上，Nida 從科學觀轉向藝術觀和譚載喜從技術／藝術觀轉向科學觀便是個證明（參見吳義誠 1997：2）。一如語言可以作為藝術（語言藝術）或科學（語言學）來探討而最終有助於實用性交際技巧的訓練，以及風格可以作為藝術（一般意義上的風格）和科學（如文體學及部分的敘述學）

來研究而有助於對寫作的根本規律的認識，翻譯完全可以從藝術跟科學兩個大方向去研究。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總是不斷的使人類對有關現象的把握更客觀、更全面、更深刻、更精細。何況“科學”本身，還包含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不同範疇呢（參見董史良 1997：2）。

一般認為，是語言學引進翻譯研究後，才產生了翻譯應該為一門科學的論斷，這對翻譯是藝術的認識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引發了這持續幾十年的大辯論。既然是語言學“一石激起千層浪”，那在反思這場爭論的過程當中可以看到，許多所謂的“文藝學”派，對語言學知之甚少；而所謂的“科學”派，對文學、文藝學理論也不見得涉獵很多，所根據的語言學，又大多是六十年代發展起來的形式語法（參見 Neubert and Shreve 1992:19-22 對語言學模式的介紹，以及 Colina 1997）。然而 Gentzler (1993: 79) 的研究發現：

Translation Studies [since its early stages] also distances itself from theories like those of Chomsky and Nida which are more focused on deep-structure generative components than on actual surface-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近年在國際譯學界姿態頗高的 Skopos（目的）理論，在反對單以語言學來研究翻譯現象時，反對的主要也是 Nida 等的產生於功能語言學之前的語言學翻譯理論（參見 Nord 1997:4-8）。

這場知己不知彼的論爭，並沒有為翻譯研究提供多少理性的見解。喬治·穆南早在 1963 年就指出這是一個各執一端不及其餘的爭論，認為“〔加里〕之所以否認語言學對翻譯理論的任何輔助作用，是因為〔他〕把語言學的定義限制到了形式描寫主義的狹隘範圍”（參見許鈞 1997：5）。中國譯學界在打了許多年筆墨官司而

不見結果之後，於九十年代末也在往一個更包容的立場靠攏，如孫致禮（1997：12）便提出“做一個‘科學的藝術派’”（類似看法見吳義誠 1997：4，郭建中 1999：56）。與世界上其他理論體系間缺少互動，使中國譯學界有些論者在這個問題上沒能及時分清“翻譯操作”與“翻譯研究”，以及 approaches 和 identity 的區別，在定義、前提不明朗甚至不同的情況下進行討論，引起了混亂，重複了別人的彎路，造成了精力物力時間的浪費，實在是很可惜的。

因此，在討論語言學與中文翻譯研究的關係時，不管是認為語言學對中文翻譯研究有用或無用的人，都先得對八十年代發展起來的諸如功能、文本語言學、語用學，更別說對語言學的最新發展（如語言與文化、權力、意識形態以及心理認知的關係），作一番認真的調查研究。在這些領域，許多翻譯或非翻譯的研究都揭示了一些有意義的超語言共通現象（參見 Colina 1997 中的英語－西班牙語的比較研究個案），可以為中國譯學提供新的研究切入點。應該說，對翻譯的研究，不管是以藝術還是科學為切入點，都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學術上出現不同意見是很經常的。不同取向的研究者們完全可以與對方既“保持距離”又保持聯繫 (engagement)，在各自進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實證與論證研究的同時，進行良性互動，各自對自己和對方的發現及結論抱開放的態度。用方夢之 (1996：19) 的話說，就是“〔翻譯研究與多門相關學科〕從不同側面協同工作、互相啟發、互相補充，又體現在繼承和發展我國譯論，使之與當代相關理論相銜接、相融合。”

五、結語

本文嘗試從國際翻譯理論體系間互動的視點，討論翻譯界長久以來存在的關於理論研究、信達雅以及翻譯的藝術／科學定性這三個老問題。目的在於顯示，在有些課題的研究中，換一個觀察角度，便可能帶來新發現新見解；而新的觀察角度、新的研究視點，往往產生於同其他理論體系的互動中。基於本文的討論，我們認為，在揭示中國翻譯研究有個成體系的傳統時，不要過分強調其“自”成體系，因為中國翻譯在世界譯學大系中是不可能自成一體的，更是無法自外於其他譯論體系的。過分的強調“特色”，只會限制自己的研究視野。相反的，中國翻譯應該而且完全能夠通過與世界譯學各體系的互動找到並確立自己的定位。

註釋

- * 本論文為香港城市大學資助的研究項目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on its current debates, tendenci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編號 9030789(CTL)) 的部分成果。
- ¹ 只要想想，在人類學或語言類型學研究中，世界各地的方言是怎樣成為各國學者共同的研究對象的，就會更明白科學研究的“無國界”性質。
- ² 該採訪見王慧〈“NBA 是我永遠的夢”——與馬健談球經〉，新加坡《聯合早報》1998, 1, 11，版 33。
- ³ 這裏指的是應用理論而非純理論，因為據稱中國譯學中尚缺純理論研究（見張南峰 1998）。
- ⁴ 《中國翻譯》英文刊名中的 Chinese Translators，大概也包括這一類的學者、譯者。
- ⁵ 應該指出，任何文化或個人，在對外界瞭解不足時都傾向於把它看作一個模糊的整體。這更加說明了客觀的、理性的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 ⁶ 我們似乎還可以加上“中國的”與“外國的”兩對立的爭論。

- ⁷ 參見 Neubert and Shreve 1992: 12ff 中的七個翻譯研究模式，以及近年興起的針對性更強的對翻譯的文化、社會功能、意識形態等的研究；可參見林克難 1998 的綜述。

參考書目

- Colina, Sonia 1997. 'Syntax,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Babel* 43: 2, 126-137.
- 董史良 1997。〈對當前翻譯研究的思考〉。《中國翻譯》6, 2-5。
- 方夢之 1996。〈譯論研究的綜合性原則——譯學方法論思考之一〉。《中國翻譯》4, 2-5, 19。
- Gentzler, Edwin 1993.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郭建中 1999。〈中國翻譯界十年 (1987-1997)：回顧與展望〉。《外國語》6, 53-60。
- Holmes, James S. 1988.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Rodopi.
- 勞隴 1996。〈丟掉幻想聯繫實踐——揭破“翻譯（科）學”的迷夢〉。《中國翻譯》2, 38-41。
- 林克難 1998。〈對理論沉寂期的反思〉。《中國翻譯》6, 9-11。
- 羅新璋 1983/84。〈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和《翻譯通訊》編輯部編《翻譯研究論文集 (1949-1983)》。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588-604。
- 羅新璋 1991。〈錢鐘書的譯藝談〉。劉靖之主編《翻譯新論集：香港翻譯學會二十周年紀念文集》。香港：商務印書館。157-178。
- Neubert, Albrecht and Gregory M. Shreve 1992. *Translation as Text*. Kent and London: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Nida, E.A.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Leiden: Brill.
- Nord, Christiane 1997.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 孫蓀（主編）1992。《論中國人現象》。河南人民出版社。

- 孫喆 1998。〈融合與分類——論翻譯理論的發展〉。《中國翻譯》5, 3-5。
- 孫致禮 1997。〈關於我國翻譯理論建設的幾點思考〉。《中國翻譯》2, 10-12。
- 譚載喜 1998。〈翻譯學必須重視中西譯論比較研究〉。《中國翻譯》2, 12-16。
- Wang, Ning and Xu Yanhong (eds.) 1996.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 special issue of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1.
- 吳存民 1997。〈論“信達雅”的有機完整性——兼評譯論中的一種錯誤傾向〉。《中國翻譯》5, 39-41。
- 吳義誠 1997。〈翻譯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國翻譯》2, 2-6。
- 許鈞 1996。〈一門正在探索中的科學與 R 阿埃瑟朗教授談翻譯研究〉。《中國翻譯》1, 2-4, 8。
- 許鈞 1997。〈關於翻譯理論研究的幾點看法〉。《中國翻譯》3, 4-7。
- Xu, Jun and Wang Kefei (eds.) 1999.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中國翻譯研究專號] . A special issue of *Meta: Translators' Journal* 44:1.
- 張南峰 1998。〈特性與共性——論中國翻譯學與翻譯學的關係〉。'98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翻譯研討會暨國際口筆譯教學第四屆年會論文，將刊於《中國翻譯》2000: 2。
- 趙秀明 1996。〈從《中國譯學理論史稿》的出版看我國的譯論研究〉。《中國翻譯》3, 35-37。
- Zhu, Chunshen. 1996. 'From Functional Grammar and Speech-Act Theory to Structure of Meaning: A three-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n translating'. *META: Translators' Journal* 41: 3, 338-355.
- Zhu, Chunshen. 1998. 'Translation: Theories, Practice, and Teaching'. A revised version of the paper was presented at '98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翻譯研討會暨國際口筆譯教學第四屆年會。

Globalization, Cultural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WANG Ning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sub-discipline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s recently changed its focus of attention: from the text to the context. This phenomenon has undoubtedly been influenced by the current prevailing trend of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o deal with issu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t is necessary first of all to approach the issue of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Globalizing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Studies

Globalization, like other Western things, has finally come into China, exercising a strong influence on China. This time, this gigantic thing does not merely function culturally and academically, but also economically and financially, posing a severe challenge to those engaged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ts advent has obviously marginalized more than 80% of the Chinese people, with less than 20% of them directly benefiting from it. China cannot but make its own choice although it is reluctant to do so: either to involve itself in this world-wide historical trend or resist it with its national mechanism. Obviously China takes the former attitude since it intends to put itself in the fierce world-wide economic competition. As a direct conseque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cholars of both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ve to confront issues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Although many of my colleagues are opposed to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I still think it necessary to adopt a dialectical attitude toward such a phenomenon. That is, cultural globalization will certainly bring us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effects: its positive aspect lies in that it

enables our cultural industry and academic research to be determined more by the rules of market economy than by the government's political intervention, thereby linking economic construction to cultural construction more closely; its negative aspect lies in making the production of elite culture or non-market-oriented cultural products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as a result of which a new hierarchy is formed. But even when confronted with this kind of impact, we could still readjust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What we should do at the moment is first of all to go along with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before using it to expand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on the world without doing harm to our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Thus it is quite reasonable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ranslation as well as translation studies since translation plays a vital rol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a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Since translation always stands between at least two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ts critical role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present age of globalization, translation plays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specially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and vice versa, with the internet be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he non-English speaking world.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comparatively independent branch of learning dealing with issu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should also be globalized, for it has already become closely linked to cultural studies, not only in the West but recently in China, thus a drastic change of focus has taken place in China's translation studies circles.

In the world of current Chinese culture and academia,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talking a lot about cultural studies has become a fashion, especiall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after the critical response to the 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debate. Undoubtedly, doing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out referring to cultural studies will not work as translation is now regarded as first of all an inter-cultural activity. So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scholars in traditional cultural studies or critics dealing with contemporary cultural criticism are exclusively interested

in this heatedly debated issue in the West, and they are even trying to apply contemporary Western cultural theory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me observable Chinese cultural phenomena. Similarly, in the long-marginalized sphe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ome schola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tried to replace traditional ideas of translation with thos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¹ This is to me a good beginning, for in my view, there should be at least two typ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its narrow sense, it deals with "linguistic translation", which is aimed at transferring the content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language; and in its broad sense, it explores how to tur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the source language into those of the target language. I will call the former "linguistic translation" and the latter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 former is to a large extent restricted to the yoke of linguistic form, and the latter, to the tension of dynamic interpretation. At the moment, along with the impact of cultural studies, translation studies is moving toward a more and more cultural and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The act of translation is first viewed as an act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n a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t cannot do without associating itself with culture. But the present state of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in China in general is that there are only very few scholars who are involve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udies; many of the translation scholars would, due to their limited knowledge of recent development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broad context of cultural studies, rather stick to the making of value judgments on the linguistic aspect of translation than enlarge the connotation of translation to include the element of culture. Since I myself have been engaged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and studies, I am more interested in exploring some relevant issues concerning translation studies in such an inter-cultural context.

Re-Defining Trans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Studies

As both "linguistic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two cultural contexts in which their cultural content is conveyed in two different languages, both types of translation can be regarded as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its narrow sense as well as in its broad sense. Undoubtedly, on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is that the translated version should be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namely, reaching the plane of the so-called “xin” (faithfulness) as was defined by Yan Fu a hundred years ago and heatedly debated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for almost a century. According to this principle, translation should first of all be faithful to the content of the original, with “linguistic translation” laying more emphasis on formal fidelity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on how to convey in a precise way the origi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how to interpret them or even rewrite them more or less on the basis of the native cultural background. Both approaches can reach the plane of faithfulness, with the former reaching linguistic fidelity and the latter, cultural faithfulness. Thus these two types are similar. Then how do we handl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This is to me the very issue current translation studies is confronted with. I once noted elsewhere that we do not have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its real sense, which could have made it possible for translators to carry on dialogues with our Western colleagues, and what we do have is only translation criticism and translation review, which is necessary for translating and translation teaching. This means that those dealing with translation criticism are largely confined to endless technical analysis and shallow value judgments of translation in practice, with their conclusions more impressionistic than theoretical. Of course, such an approach can be more or less useful to translation teachers and practitioners, but it cannot be theorized on globalized as universally applicable guiding principles. It may be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comparatively independent branch of learning in China has long been neglected or even intentionally marginalized.² I now still hold this view, bu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joint efforts made by our colleagues, things have been largely improved: China’s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certainly taken a new step towards reaching an

international level of scholarship.³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n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been held in China, and quite a few Chinese scholars frequently attend conferences abroad and publish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etc.⁴ All this indicates that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is now beginning to move from its original peripheral status to the academic centre, in an attempt to carry on a dialogue with 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scholarship.

Since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have entirely different traditions, either is more or less “mysterious” to the other. It is true that such a “mysteriousness” has been in existence for quite a long time:

In surveying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one encounters so many traditional misconceptions, shibboleths, and half-truths that no systematic analysis is possible before these “weeds” of confusion are cleared away. Yet these “errancies” are not blatant “vulgar” errors, for they cannot be accurately characterized as weeds to be cleared away or destroyed, since each of them contains a kernel of truth that must be recognized. It is for this reason I call these anomalies “myths” rather than errors, because “error” would presuppose a prior original “truth” that is contravened. (Eoyang 1993: 3)

Obviously, the above conclusion is arrived at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since Eoyang himself is an “inter-cultural” scholar or a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st. But if we want to communicate with our Western colleagues on an equal footing, how could we overcome the hindrance posed by such a “myth”? To me, we should neither cater to the taste of Western scholars nor express our own view without paying any attention to Western audience. For neither of these approaches will lead to real dialogues. What we should do is to find a topic of common interest which will stimulat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even debate in our inter-cultural comparative studies. In this way, the dialogue will have significance. At present, what kind of topic will enable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to have dialogues on the issues concerning translation studies? Can we find a way of transcending the

hindrance of language and academic discourse? Judging from the present scholarly interest both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 I think cultural studies might well function as the common ground on which we could break through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in ou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academic dialogue.

As far as cultural studies is concerned, one would immediately think of the cultural studies prevailing in Western cultural and critical circles. It obviously does not refer to elite culture in its traditional sense, but rather refers to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and even popular culture, of such topics as ethnicity, gender, race, consumer culture and mass media. The rise of cultural studies has undoubtedly paved the way for all the marginalized discourses to challenge elite culture, thus realizing its project of moving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centre and functioning both at the periphery and the centre. Hence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means of cultural and literary communication is included in cultural studies, which actually functions as an umbrella covering all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It is in effect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cultural branch of learning prevailing in current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and in recent years, cultural studies has also been playing a more and more dominant rol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life, especially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As is well known, the cultural studies that the present essay discusses first rose in the British literary research field of the fifties, with F.R. Leavis as its representative. At that time, cultural studies was only characterized by cultural criticism of literary phenomena, with a strong elitist flavour. In the face of the impact of some subaltern discourses, there have appeared pluralistically-oriented directions within the domain of cultural studies, with one force gradually stepping out of the earlier sphere of the study of canonical literature. That force includes studies of society and community life and even the mass media, thereby converging into the mainstream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As cultural studies is more concerned about contemporary and non-elite culture (or, more specifically, popular culture

and mass media), it should not exclude translation studies since translation itself is always regarded as a means of cultural and literary communication. As far as its basic definition is concerned, the major task of translation is to transform the cultural content in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so whether it is faithful or not largely depends on the degree of the translator's grasp of the two languages both in form and in spirit and of the subtle difference in cultural content as expressed in the languages involved. Thus translation cannot but encounter the problem of culture and its representation. Speaking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one literary work which is not so popular in its source language could become extremely popular in the target language largely due to the effort made by its translator in representing not only its original meaning but also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terms of the cultural soil on which the work is received.

To observe trans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studies, therefore, might well lead to an expansion of the domai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hich has traditionally been rather limited. But how do we reconstruct from the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 defini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Here I would venture to offer my humble opinion from a new angle. In view of the long-standing marginality of translation, its study is actually a *marginal* discipline between social science, natural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 in terms of its positivistic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micro-perspectival observation, it is undoubtedly a sub-discipline belonging to *social science*; in terms of its relations with the mass media and its func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high technology and computer science, it cannot avoid being affected by *natural science*; and in terms of its broader meaning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its interpretive function, it is obviously related to the *humanities*. Such an interdisciplinary feature and such marginal characteristics certainly give rise to the indeterminacy of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hich is an advantage as well as a disadvantage: any people engaged in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or research could regard themselves as translation scholars when they cannot be included in a specific discipline; similarly, translation scholars

can do research from their respective disciplines o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his is the paradox and tension in the defini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on the basis of which we could re-consider and re-define this branch of lea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udies.

Cultural Relativism Reconstructed in Regard to Translation Studies

Since translation studies is first of all concerned with culture, we should recognize the relativity of culture, or cultural relativism in its new global sense. As is well known, cultural relativism has recently once again aroused interest and led to a theoretical debate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s, but this old issue in the context of current cultural studies has been endowed with new significance, stepping out of the narrow Eurocentric domain into a much broader cross-cultural sphere. Although cultural studies is not a well-defined discipline, nor is it a definite body of theory, it has been developing by leaps and bounds in recent North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interdisciplinarity, which makes it appropriate enough to include translation studies. Its reaction to cultural relativism lies in that it enables us to reach such a conclusion through observing the broad periphery outside of the centre: any culture exists in relation to another culture, any culture has its own strong points and weak points, and no culture can avoid undergoing such periods as those of germination, development, prime of its life and decline. So no culture can forever dominate over world culture. Similarl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unidirectional influence of one culture on, or penetration into, another culture. As Oriental culture and Occidental culture have always influenced each other, when one of these is in a state of temporary dominance, it might well influence the other, but even so such influence is mutual and largely depends on the other's dynamic and creative reception. According to Edward Said, the "Orient was almost a European invention, and had been since antiquity a place of romance, exotic beings, haunting memories and landscapes, remarkable experiences." (1) In

this sense, Orientalism is actually "constructed", which "stands forth and away from the Orient: that Orientalism makes sense at all depends more on the West than on the Orient, and this sense is directly indebted to various Western techniques of representation that made the Orient visible, clear, 'there' in discourse about it" (21-22). But the existence of this image or cultural construction has to a certain extent helped Western people to confront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of this phenomenon. Along with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ent by Western people, the falsehood of Orientalism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conspicuous. This is the very significance that cultural relativism has revealed after the thirty-year-long debate on postmodernism and then postcolonialism on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and it might well enlighten us with regard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cholars'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in its traditional sense has been undergoing a sort of shift: from sticking to "linguistic translation" to focusing on "cultural translation", which will very likely become dominant in China's translation studies circles. Therefore,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is actually a matter of research on culture, especially on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two cultures. I believe that the rise and fal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la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role it plays in academic circles. When "Eurocentrism" dominates in our research, we would lay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ranslating foreign culture into China, and our methodology always follows Western methods of academic research. We even try to communicate in a unidirectional way with Western academia at the expense of our sense of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re is no communication on an equal footing with our Western colleagues.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Western culture has shown signs of inevitable crisis, and some far-sighted Western scholars have come to realize more and more the aesthetic value and profound meaning of Oriental culture. Thus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us translation scholars to highlight the spirit and identity of Oriental culture, and carry on

a dialogue with Western culture. In this sense, the rise of Oriental culture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writing off Western culture, but rather, it means co-existing with the latter on the same level, and having a dialogue with Western culture on an equal footing. At present, from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our emphasis should be laid particularly on introducing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abroad, so as to present a truer picture of China to more people.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promote mutual understanding with our Western colleagues. And in view of this, translation is an indispensable means for us to deal with comparative studies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literatures, especially between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es. Cultural studies is thus the very ground on which different cultures,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branches of learning as well as different fields of art and representation can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The postmodernism debate in China and some other Oriental or Third World countries in recent years has undoubtedly broken through the "Eurocentric" mode of thinking, paving the way for us to question Western postmodern theory with the writing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phenomena of the Third World. At the same time,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on the question of postcolonialism or postcoloniality have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decolonizing Oriental and Third World culture.⁶ Since cultural studies is concerned with contemporary non-elite culture, it will help us question the traditional "Eurocentric" canon formation, causing Oriental culture to move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centre and deconstructing the myth of the so-called monolithic centre. Hence it is of vital significance to translate Oriental culture for the whole world.

Let's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current Chines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relation to our translation studies. For the past ten years or so,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China's cultural and literary studies, which prove that it is a historical tendency to have theoretical dialogu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refore, cultural studies has not only crossed the boundarie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between language and representation, and between Eastern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but also deconstructed the artificial gap between the periphery and the centre, so it becomes possible for Oriental culture and literature to move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centre of the world. Disciplinarily speaking,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has long been attached either to linguistics or literary study, and it can not even be tolerated in some universities.⁷ The flourishing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of the early 1980s once helped to legitimize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urrent strength of cultural studies has more or less obscured the boundary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study, paving the way for a new discipline--translatology--to rise in China's academic circles. Taking this into account, what do we think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t is obviously far from satisfactory. Some translators would rather spend time "re-translating" canonical literary works and leave some newly published contemporary works untranslated. Translators would rather do repeated translation work from foreign languages into Chinese than vice versa, since "translating out" is more difficult and costs much more time and energy. Quite a few translation scholars are still interested in the endless debates on translation practice or the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Chinese versions of foreign literary works. Such debates can never be conclusive, for they seem to neglect the fact that truth can only be approached rather than finalized. Countless relative truths amount to an absolute truth. Meanwhile, such endless debates do not reach a theoretical and academic height. There is much to do in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a cross-cultural point of view. In this sense, cultural studies could at least provide us with a new perspective from which we could push forwar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enabling us to stand on a higher plane and transcending the *either/or* mode of thinking, in an attempt to explain all the cultural phenomena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Only by putting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broad context of cultural studies can we carry on a dialogu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on an equal footing.

Translation and the De-marginal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t is true that cultural studies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econstruction of artificial binary oppositions, such a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elite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enabling the intellectuals shouldering the task of enlightenment to step out of the ivory tower and become involved with the broad masses of people. In this way, they will first identify themselves as one of the people and then realize their ideal of "post-enlightenment". Cultural studies also crosses the border between Oriental culture and Occidental culture, making it possible for them to communicate and have dialogues. To realize this aim, translation is no doubt an indispensable means. Unfortunately, there has been an imbalance in China's cultural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s, with the number of translations of foreign culture far exceeding that of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ulture, because we have more and more translators who try to introduce Western culture into China than vice versa. I think it will be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one can mak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o be able to translate Chinese works into foreign languages, and directly communicat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orally in foreign languages.

Last but not least: I would say a few words about the so-called "decolon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bout which there have been heated debates among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Here I still maintain my stand: Chinese culture, which is profound in content and splendid and rich in heritage, cannot be "colonized" although it has been largely "Europeanized" or "Westerniz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1997b: 44-45) It is true that we lack our own critical discourse and have borrowed a lot in our cultural and literary criticism, according to some scholars. Also it is true that we have to publish our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international language--English--which is said to have "colonize"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ulture largely due to the adv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But it is an

inevitable stage through which Chinese culture will become more mature and join the mainstream of world culture. So it is unnecessary to launch a campaign to "decolonize"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language, which may well give rise to a new situation of isolating China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 should not, however, neglect another fact: in world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is still in an peripheral position, and its value has by no means been fully recognized by the world, with the exception of very few sinologists. Therefore, it might help Chinese culture to move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centre and deconstruct the myth of the monolithic centre if we set off to "de-marginalize" and "de-territorialize" Chinese culture, starting with translation and its studies. If this is done in an adequate manner, it will put Chinese culture in a favourable position and allow it to carry on a dialogue with Western culture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scholars. The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and its studie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an therefore never be replaced by other branches of learning or other means of communication.

Notes

- ¹ At the 15th Trienni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Leiden, 1997), the topic of the seventh session is "Reconstructing Cultural Memory: Translation, Scripts, Literacy," and almost all the papers read in this session dealt with translation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 ² Ironically, there is no independent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in any universities in the mainland, except one college training translators for the United Nations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while in Hong Kong, at least two universit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Lingnan University, have a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This must be related to the long-marginalized position of translation in China's university curriculum.
- ³ This could find particular embodiment in China's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on the graduate level for MA in some universities. Also, the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has established close contact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nslators.

- ⁴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80s, quite a few Chinese scholars have published in such international journal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Target*, *Perspectives* and *Babel*, which is indeed remarkable among all the fields of social sciences.
- ⁵ As for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Orientalism and Occidentalism and its deconstruction, cf. Wang 1997.
- ⁶ I should point out here that even today, translation studies does not have an independent MA programme in China's universities although it did have some in the past few years. Due to the recent readjustment of disciplines, it is included in the programme of foreig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Works cited

- Beebe, Thomas O. 1990. *Clarissa on the Continent: Translation and Seduction*. University Park & Lond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Eoyang, Eugene Chen. 1993. *The Transparent Eye: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Han, Jiaming. 1996.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ranslation Redundancy Reconsidered," in Wang & Xu, 115-26.
- Hightower, James. 1970. *The Poetry of Tao Ch'ie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Inglis, Fred. 1993. *Cultural Studies*.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 Lefevere, André. 1992. *Translating,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Said, Edward.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Wang, Ning. 1996. "Translation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Comparative Culture Studies," in Wang & Xu, 43-52.
- Wang, Ning. 1997. "Orientalism versus Occidentalism?" *New Literary History*, 28. 1: 57-67.
- Wang, Ning. 1997b.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riel*, 28. 4: 33-47.
- Wang, Ning & Xu Yanhong (eds). 1996.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 special issue of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No.1.

繼往開來 融通中西 ——二十一世紀中國翻譯研究展望¹

陳潔瑩

翻譯是一門國際性的研究學科，今天已是全球翻譯界的共識。所謂國際，是指在世界各地學府、研究機構均有普遍開設不同程度的正規課程，並有學術隊伍從事高水平的研究工作。近數十年來，中國翻譯研究有長足的發展，課題除一貫的翻譯標準、翻譯過程、翻譯經驗談、譯品評賞、翻譯途徑外，還綜合地在此基礎上參考文藝學、語言學、社會學、傳意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對多種體裁、傳意情況作微觀研究，發展實踐導向的應用理論或本體導向的抽象理論。學者就翻譯學科的研究範疇、發展路向提出不同的意見，在概念的界定，學科術語的統一²，應否與國際慣例看齊，中國的翻譯研究應該面向世界還是要有中國特色³等等問題上，出現了一些爭論。踏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或“地球一體化”(globalization)之說甚囂塵上，肯定會對各地翻譯研究的發展造成影響，本文擬就此進行探討。

一、名稱問題

首先是概念與術語問題。這其實亦涉及詞彙制度化與全球化的問題。以下試舉幾例說明。備受推崇的《翻譯新論》(楊自儉、劉學雲，1994)收錄1983-1992年的論文多篇，展示我國十年間翻譯

研究的成果，分別錄入三大篇：“翻譯研究(Studies on Translation)”、“譯學研究(Studies on Translatology)”、“跨學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這似乎不甚妥善。首先，“譯學”應為“翻譯學”的簡稱，按理是上位(superordinate)概念，涵蓋一切與翻譯有關的研究與知識，應該而且必定包括跨學科研究；在基本字義看來，應等同於“翻譯研究”。論文集既取名《翻譯新論》，簡介處說是“關於翻譯研究的論文集”，似乎“翻譯研究”與“翻譯”、“翻譯學”沒有太大分別，即涵蓋一切與翻譯有關的現象、過程、行為、理論、研究。但書中的分類並非如此，究竟書中的“翻譯研究”篇與“譯學研究”篇有何不同？翻開書頁，“翻譯研究”篇似乎着重實踐技巧、譯品批評與翻譯的藝術性，卻包括〈科技翻譯理論研究〉、〈中國呼喚企業翻譯學〉、〈JFY-V機器翻譯系統〉等文，而“譯學研究”篇似乎着重翻譯的理論性與科學性，但當中卻包括〈翻譯的神韻觀〉、〈翻譯的風格論〉、〈尋找譯品中的真善美〉、〈也談文學翻譯〉等。再看書中〈內容簡介〉和楊氏首篇〈論我國近期的翻譯理論研究〉的敘述，原來“翻譯研究”指不同文體的翻譯研究；“譯學研究”指本體論研究，包含翻譯標準、翻譯單位、翻譯批評、翻譯史等研究；至於“跨學科研究”，則涉及語言學、語義學、語用學、文化學、符號學等範疇，而三者合為“翻譯理論研究”。種種名稱概念實在教人摸不着頭腦。又例如“譯學研究”篇中〈中國譯學研究的回顧與反思〉一文(433-444)，慕名拜讀卻彷彿霧裡看花，再查看英文題目才恍然大悟，原來是“On the Evolution of Translation Criterion”。當然，純粹批評某人某書為何要如此這般分類，而不是如此那樣去做，意義不大，亦非本文的目的。本文的

出發點是，既然翻譯已一致公認為世界性學科，就有必要澄清概念，建立一套明確的規範詞彙，方便研究與教學。

其實，有關翻譯的文章浩如煙海，要把洋洋灑灑的文章分類，統一詞彙，困難着實不少。一般論集把論文按時間先後臚列，如《翻譯論集》（羅新璋，1984）、《翻譯研究論文集》（中國譯協，1984），或是索性不分類，如《翻譯論集》（劉靖之，1981）、《翻譯新論集》（劉靖之，1991）、《譯學論集》（張柏然、許鈞，1997）、《翻譯思考錄》（許鈞，1998）。十年來不少學者銳意作宏觀的多向度、跨學科的理論構架建設，開拓研究範疇，使翻譯從一門專業培訓提升為一門學科，不再是外語研究、比較文學的附庸；但一門學科必須有精細嚴密的學科架構，其下各個研究範疇要經周密定性，並符合現代開放型學科應有的靈活綜合、自由擴充的條件。翻閱近年來出版的中國翻譯專著、學刊、論文集，當中發現不少詞彙混淆的問題，最基本的就是翻譯這門學科及其下各研究部的名稱；有些論者竟把翻譯理論、翻譯科學、翻譯學、翻譯研究等混為一談。筆者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學科的歷史尚淺，不少學者對學科的構架掌握不穩，以致口說“譯學”、“科學”，但腦袋仍留在技術／實踐層次，口說“中西並重”，但內心仍放不下民族／崇外情意結（下文另作討論）。究竟這門學科，應該正名為翻譯學、翻譯研究、翻譯科學，又或是簡單地叫作翻譯、翻譯理論也可？又是否需要標榜為“中國翻譯學”？

這裏我們不妨參考其他國際學科的系統，例如經濟學。經濟這門學科可稱為經濟、經濟學、經濟研究，可作理論性、描寫性或應用性的研究，傳統分微觀與宏觀兩途，範疇很廣，既可局部研究供求、資本、貿易、貨幣等個別課題，也可擴而充之，再劃分市場

(經濟) 研究、計劃經濟研究、價格研究、國際貿易研究、金融經濟研究等專部。隨着時代的發展，個別專部甚至自立門戶，另立新科，如市場學、價格學、金融學，但畢竟還是源於經濟學。至於說環境經濟學、技術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究竟隸屬經濟學，還是環境學、技術學、政治學，則任何發展完熟的學科必然會涉及其他範疇，上述研究部均屬經濟學的外部、跨學科研究，固然屬經濟學的一支，同時也可以是其他學科的外部、跨學科研究。但是，若說經濟理論就是經濟學；以科學論證方法研究經濟，就斷言經濟學等同經濟科學或科學，就是抹殺其人文及社會性。蓋經濟學是上位概念，其他的“理論”、“科學”等均為下位 (hyponym) 或屬性 (attribute) 概念。

同樣，翻譯這門學科，可喚作翻譯、翻譯學、翻譯研究，研究可屬純理論性、描寫性或是應用性。翻譯確立為一學科，始於七十年代初的西方，當初也存在著名稱問題⁴。早在六十年代中，奈達 (Eugene Nida) 提出“science of translating” (翻譯科學)，以別於翻譯藝術和翻譯技術，其根據是翻譯過程有跡可尋，可作科學性的描述 (1964:3)，然他這科學觀主要受喬姆斯基 (又譯：杭斯基) (Noam Chomsky) 的結構語言學觀影響，並應用於聖經翻譯。其後又有學者使用“science of translation”一詞，如科拉 (Koller, 1989) 和威爾斯 (Wilss, 1982:79)，都是指以科學手段研究某些課題，可見所謂“翻譯科學”乃屬性概念。另有學者以“translation theory” (翻譯理論) 一詞代表對翻譯過程和譯品作系統研究的學科 (Popović, 1976:23)，或是有關翻譯過程的知識體 (Newmark, 1988:19)，但很多學者認為，翻譯學科的範疇不限於理論 (Holmes, 1988:69)，恐怕只有極少數理論家同意把整個學科定義為翻譯理論 (Lambert,

1991:30)，故現在一般的共識是翻譯理論即系統地解釋翻譯現象的陳述，是翻譯學科中的一個範疇，是下位概念。另外一些學者，為了突出翻譯作為國際學科的地位，在七十年代初另創新詞：“traductologie” (法文)、“translatologie” (德文)、“translatology” (英文)，欲與“sociology” (社會學)、“geography” (地理學)、“anthropology” (人類學) 等看齊，指對翻譯的科學研究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translation) (Harris, 1977:90-91; Goffin, 1971:59; Rado, 1979)。由此看來，所謂“-logy”與“science”，其實指研究方法 (methodology) 與心態 (mentality) 而非學科，主要針對傳統主觀、隨感、模糊、雜亂式探討之不足，希望以客觀、系統的實驗方法對翻譯現象作巨細無遺的分析研究，但以科學方法研究翻譯並不代表翻譯就是一門科學，而科學的翻譯觀與翻譯學科又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思維模式 (mode of thinking)，後者是與翻譯有關的整體知識 (whole body of knowledge)，不能以偏概全。有學者指出，“科學派”往往局限於以語言學途徑研究翻譯 (Snell-Hornby, 1988:14)，而且創造新詞作用不大 (Holmes, 1988:68-71; Pym 1992:181)，以此命名的專書不多⁵。中國學者亦有相應提出“翻譯學”，但中國人接受“翻譯學”似乎較西方人接受“translatology”等新詞容易，由於中國文字的單音節表意特性，創造新詞只須把現成詞素自然靈活地組合，無須像多音節表音的西文般另起爐灶，加上“翻譯學”一詞能代表上位概念，故能獲多數學者認同，近年即出版了不少以此命名的書刊⁶。

不少人對“科學”一詞趨之若鶩，非要把翻譯定性為一門科學不行，彷彿不是科學就不值得研究，追不上潮流。其實，傳統人文學科“升格”為“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可追溯至十八世紀

的西方，由於“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s)的成功，人們相信人文社會科所關心的事物和現象有客觀規律可尋，可透過與研究自然界同樣的科學方法研究，但到了十九世紀末，很多社會學家均意識到自然科學的研究途徑並非唯一絕對的研究手段，要解釋某些複雜的現象，直接的觀察與詮釋比做實驗效果更佳，故客觀定律與直覺詮釋兩者不可偏廢。翻譯亦然。現代人類，就連幾乎壟斷了科技文明的西方，亦認識到不管科學如何發達，也解決不了現象界(phenomena)所有問題，更遑論致思界(noumena)。中外學者都同意翻譯有其技術性、藝術性、科學性，紐馬克(Peter Newmark)更提出翻譯的品味層次(a matter of taste)(1988:6)，這全是屬性概念。我們在以相對科學的形式論證手段研究翻譯的技術性、科學性課題之餘，亦不可抹煞傳統文藝美學、主體之悟途徑對解釋翻譯的藝術性的積極作用。需知譯界提出科學、翻譯學，是基於傳統的研究方法缺乏定界分析和邏輯依據，故輔之以科學論證方法；傳統的研究往往限於個別命題，缺乏綜合實踐導向，故繫之以譯學構架系統。如此則翻譯的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更為完備，整個翻譯的知識體系更為嚴密。其實，科學手段與學科系統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翻譯研究與翻譯學肯定是一門學科，我們亦希望翻譯學科的研究盡量科學化，便於教學傳播。就很多範疇而言，翻譯研究可算是一門實驗學科(empirical discipline)；但若要爭論翻譯研究本身究竟是否一門科學，恐怕意義不大，這根本並非關鍵所在。

“一名之立，旬月踟躕”(嚴復〈天演論·譯例言〉)。有學者提出“翻譯學”或“譯學”才可，“翻譯”則不可。例如譚載喜指根據《辭海》的定義，“翻譯只是言語產物即話語的一種語際(或語內、符際)轉換過程，而不是‘知識體系’”(1987)。毋

庸置疑，“翻譯學”一詞名正言順，但是否只此一家，則大有商榷餘地。首先，翻譯學科既然是西方以至東方近二十幾年來“新得之學”，定名方面實不能斤斤於舊書古訓；《辭海》有“翻譯學”一條，對於“翻譯”的定義雖然已較孔子對“繙”即“小辨”“傳言”、“反舌”(陳福康，1992:12-13)的理解進步，但今天國際間對於翻譯的認識早已不再限於語際轉換層次，研究之深之廣實在教學者們興奮。要條分縷析的檢辨定義，必須鑽研本科的專門術語詞典，才算切合時宜，故任何完備的學科必定有其學科詞典，並以當中較具代表性者為權威。此外，有些學科去掉“學”字也能成其學科，例如經濟、歷史、地理、物理、工商管理等；而儘管此等學科(哪怕是人文學科)的研究方法極其科學，亦毋須硬要說成甚麼經濟科學、地理科學、工商管理科學、物理科學，蓋此乃約定俗成(此等學科發展也較久)。由此可見，“翻譯學”固然是絕對正確而且正式的名稱，但一般情況下，“翻譯”一詞也可接受，至於“翻譯研究”一詞，就如“經濟研究”、“歷史研究”、“物理研究”一樣，當然也是毫無問題。再回顧西方的經驗，愈來愈多學者認為“translatology”一類新詞實無必要，寧取平實的“translation studies”(翻譯研究)一詞，涵蓋一切有關翻譯的研究與知識，作為上位的學科概念。此外，各地愈來愈多研究翻譯的書刊取名“翻譯研究”或“Translation Studies”⁷，或索性以“翻譯”或“Translation”命名⁸。更令人鼓舞的是，近年出版了幾部翻譯大詞典和翻譯大全⁹，標誌着翻譯學正茁壯地成長，此類專科參考書對我們掌握術語概念，尤其個別課題的歷史發展很有幫助。

中國文化思維模式強調主體意識，重直覺了悟，文藝傳統常採印象性交感，善於模糊集合，導致術語名稱欠統一，論證手段欠科

學，這點不少學者也有討論（見劉宓慶，1990；譚載喜，1998；Yip, 1969）。但正如上文所述，翻譯學科名稱混淆的問題，似乎主要跟其發展時間尚短有關，因為西方也曾出現過同樣問題。正因如此，我們必須澄清概念，首先對這學科的名稱達致共識，“翻譯學”也好，“翻譯研究”或“翻譯”也好，視語境而定，而不應稱為“翻譯理論”（此乃下位範疇），也無謂說成“翻譯科學”（此乃手法屬性）。

二、學科構架

學科名位既定，便可進而理清其下的研究部與術語。一門學科要發展完熟，必先有精密綜合的發展構架。有關翻譯學的學科構架，可參考霍姆斯 (James Holmes) 的經典論文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譯研究的名稱與性質）（1988；初稿於1972年發表），以及劉宓慶的鉅著《現代翻譯理論》/Studies on Translation Today（1990）；兩者皆較具代表性。霍姆斯認為翻譯學科最宜定名為 “Translation Studies”，是一門實驗性學科，翻譯研究的目的是要描寫翻譯工作及翻譯成果在人類經驗界所展現的現象，就此制定普遍的定律去解釋和預測這些現象，並據此所得，指導翻譯實踐與翻譯培訓。學科規劃分二大部：純粹研究 (pure studies) 與應用研究 (applied studies)。純粹研究分理論性 (theoretical) 與描寫性 (descriptive)，純粹理論性研究分普遍理論 (general) 與局部理論 (partial)，普遍理論就某些範疇作整體理論研究，局部理論則就個別課題作孤立理論研究，例如個別媒體 (medium)、話語層級 (rank)、文體 (text-type)、時期 (time) 等；純粹描寫性研究可以譯品

為本 (product-oriented)、過程為本 (process-oriented) 或功能為本 (function-oriented)；應用研究則分翻譯培訓 (translator training)、翻譯輔助工具研製 (translation aids)、翻譯政策 (translation policy)、翻譯評賞 (translation criticism) 四大範疇，可謂條分縷析（詳見圖一）。此外，霍姆斯又指出其構築屬開放型，理論、描寫與應用性研究三者存在辯證關係，並提出可再進一步從歷史研究 (historical study) 及方法論或元理論研究 (methodological or meta-theoretical study) 兩個層面與此框架配套，對“翻譯研究”進行研究。

至於劉宓慶，他明確指出翻譯學為開放型、綜合性學科，構架分為內部系統與外部系統，內部系統為翻譯學的本體構築體系，分翻譯史、翻譯理論、翻譯信息工程三大領域；外部系統為翻譯學的功能參照體系，分哲學思維、語言符號、社會文化三大領域（詳見1990:15-22）。其實所謂外部系統，筆者以為即對翻譯進行跨學科研究 (interdisciplinary study)，此與霍姆斯及現代國際翻譯界的共識不謀而合。本文不打算就上述兩套構架長篇大論，只想提出以下幾點。

第一，翻譯學框架的構築有助界定固有範疇，澄清詞彙概念，拓寬研究視野，避免無謂爭論，提升研究水平。這樣，有關科學與藝術、理論與實踐、學科與科學等矛盾不再存在，學者可按各自的興趣對個別命題或整個範疇作微觀或宏觀研究，或是進行綜合課題、跨學科研究。蓋任何研究都有助豐富翻譯學的總體知識，每項研究都在各自的範疇內佔一席位，供其他研究參考借鏡；就是表面毫不相干的研究，將來也有機會對話甚或接軌。這亦符合人類知識發展的斷續性 (discursiveness) 與一定的偶然性 (incidentalness)。

第二，從兩套構架可清楚地看到各研究課題在學科構架中佔一

定位置而非全部位置，亦可見到其他課題的相對位置，彼此之間有着辯證的關係，這樣我們對待傳統、對待歷史的態度就可更加正確。以往沒有翻譯學，理論亦不多，主要因為當時社會時代仍未有此需要，但不可謂沒有研究或不值一哂，傳統研究的核心範疇如翻譯方法、翻譯評論、譯者培訓等，都在各自範疇內對當時的翻譯研究產生指導、推動的作用，亦在各自範疇內成為現代翻譯研究的基礎知識，後學可按需要和興趣，對傳統課題作微觀性補充研究，而不能因其不能解決現代的翻譯問題而謂其不合時宜；亦可對傳統課題作發掘性現代解讀，使其生命力得以延展。這亦符合人類知識發展的歷時性 (diachronicness) 與歷史必然性 (historical necessity)。

第三，翻譯學有助發展並提高傳統以來被忽視甚或壓抑的知性理論。以往翻譯理論只重實踐應用，流於技術水平，以致外間認為翻譯只能成為一門專業，充其量亦只能是一門具藝術性的專業；即使是研究較高境界的文學翻譯，亦只屬文藝學研究與比較文學研究，撇開翻譯任務的完成與完善就好像沒有其他討論。翻譯學構架明確展開應用理論、描寫理論與純粹理論的格局，讓我們在不貶斥應用研究之餘，亦可致力於純粹甚至形而上的理論探索。蓋任何學術發展至最高峰，哲學的探索必不可少；翻譯學當包涵翻譯哲學，即以理智及觀念對構築翻譯的基礎、假設、命題種種加以反省說明，這有助翻譯學地位的提升與層次的昇華。

第四，隨着翻譯學構架的展現，學科發展將更趨完熟，除有助與其他學科接軌外，更可加強中西方深層的對話與接軌。以往翻譯學學科架構範疇不明確，各國各派各自進行研究，或不相往來，或互相攻擊，或以為自己的研究途徑和成果才具代表性，或以為所有研究必須達致統一的結果。從兩套構架可見，中西方現代翻譯學的

鴻圖在佈局方面雖未完全一致，精神和遠景卻是互通的，近來各學科（不僅是翻譯學）各範疇都重比較研究，而完備的學科構架可拓寬這類研究的視野，提升其討論層次，有助各國各派、中西方了解、尊重甚至融通彼此間不同的研究途徑和成果。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派別按不同的現實情況及需要採取不同的方法進行不同的研究，都是對整個學科有貢獻的，不應拘泥於門戶之見、新舊之爭，蓋彼此只是從不同的出發點研究翻譯，站在不同的位置看世界罷了，意氣之爭本屬無用。

第五，現代翻譯學明確辨析理論和範式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一致性與相對性，學者可按各自的學術興趣研究。只就本屬語言文化母體進行翻譯研究，不可謂其目光不夠遠大，而現代翻譯學的構架則展現跨系統的格局，學者可參照他國翻譯學成就對本屬的語言文化系統進行翻譯研究，或對地隔人殊的他國翻譯學成就進行純粹研究，不可謂其於本國研究無所作用。蓋一個開放型的現代學科，必須包容任何方位、本位的學術研究，並以融通為最終目標。譬如說經濟學，有普遍適用的經濟理論，亦有個別地區根據自身情況發展的特殊經濟理論，大家同屬經濟學範疇，而經深入研究，某些特殊的經濟理論對其他地區的研究可能有參考作用，甚至有一天可能成為普遍適用的經濟理論。各地的經濟學縱然在某些範疇總有自身的特色，但作為學科，無所謂中國經濟學、美國經濟學、英國經濟學，蓋這些全屬下位概念。個別研究在翻譯學的學科構架中各施其工，各歸其所，為新與舊、內與外、中與西最終的融通提供基礎。

三、融通中西

踏入二十一世紀，有所謂“地球村”(global village)之說，各大文化、經濟體系彷彿有共識要打破彼此在各個領域的壁壘，求同存異，達致“地球一體化”。這是否必要，能否達成，並非本文討論範圍¹⁰，本文只討論這對翻譯學的意義與影響。

首先檢視何謂“地球一體化”。一體是甚麼體，哪個體，會否某體獨大，淹沒其他小體，造成實利主義、霸權主義？恐怕爭論永遠沒完沒了。正如上文所述，各地體系有同有異，尤其東、西兩地，通過不同的“孔”去看世界，認識真理，體驗生命，文化母體迥然不同，這有形而上的必然性(metaphysical necessity)(牟宗三，1983)，求其一體就算可能，也絕非易事。東方傳統重視內容的真理(intensional truth)，先哲定下的最高目標，為學的最終目的，是透過主體超越，轉識為智，天人合一；西方傳統則追求外延的真理(extensional truth)，把客觀肯斷、邏輯認知提到否定主體態度之上，彼此各有利弊。若求一體，必應先展開對話，彼此尊重，然後互相調適，互補長短，各自保持自有的優勢，以貌離而神合的姿態迎接下一世紀。所謂全球化，必須是求同存異，包容性強，而翻譯學可幫助我們邁向這長遠目標。

首先，翻譯學的建立促進全球翻譯學者為此學科共同努力，隨地域文化而殊的研究只會豐富學科的資料庫，迥異的研究路套只會擴大學科的視野，在中國、歐美、非洲、澳洲研究翻譯學，不會有衝突，不存在誰優誰劣的問題。翻譯學嚴密的學科構架展示了發展藍圖、長遠目標和研究規則，至於研究的對象與材料，當然會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所有學科亦然。故西方的研究自然以西方的文字文

化為出發點，西方某國的研究亦自然以其本身的文字文化為出發點，蓋人類首先對其自身所處環境、所屬文化母體產生興趣與歸屬感，實在無可厚非，而且無論研究課題、觀點如何多樣化，亦不免受當下的時代思潮或學術潮流所影響，並首先為當地讀者和對此課題有興趣的他國讀者服務。中國亦然。十年來不少學者振臂高呼，要建立中國的翻譯學，確立中國特色的翻譯學，中國譯論要有中國味等（見桂乾元，1986；劉宓慶，1990；1991；張柏然與許鈞，1997:1-2；譚載喜，1998；沈蘇儒，1998:258-263），側重以本屬語言文化母體為研究對象，這可能因為翻譯學在中國只有十幾年的歷史，過去對本屬文字文化的研究仍未夠廣夠闊夠深，論證手段不夠科學，亦未能結合其他學科的知識，故中國翻譯學者應以中國現實為研究對象，按理無暇旁及與本身互不相干的系統。這是可以理解的，而他們亦同時指出有必要參考有用的外國理論。但正如上文指出，所謂某某國家的翻譯學只屬下位概念，待認識清楚翻譯學是一門國際學科，不同體系將來大有機會接軌，以及本國對象屬自然與必然的研究範疇以後，就毋須再刻意強調。不同地方的翻譯學應與所有學科一樣，植根傳統，放眼世界。

上文說到翻譯學令我們對待傳統、對待歷史的態度更加正確，這與近年我國學者不斷提出要正視傳統不謀而合。翻譯學構架為翻譯傳統提供跨學科、跨文化的高視角研究途徑，我們可從中對其他領域有更深甚至簇新的掌握。譬如很多學者提出中國傳統翻譯理論不夠完備。中國翻譯的可信史始自周代（約公元前十一世紀），有關翻譯的理論則發展稍晚，一般認為公元三世紀支謙的〈法句經序〉是最早帶有翻譯理論性質的文章，當中提及天竺名物翻譯之不容易，以及質直的翻譯原則。西方則源自公元前四十六年古羅馬人

西塞羅 (Cicero) 在 “The Best Kind of Orator” (最優秀之演說家) 文中所指不要逐字翻譯而要保留原文的風格、張力、氣勢 (Robinson, 1997:6-12)。似乎中西譯論一開始就分道揚鑣，西塞羅主張意譯，支謙則主張直譯；不過，從現代翻譯學的研究看，參考社會文藝、歷史哲學、行為目的等因素，孰文孰質的取向，與西、支二人的出發點大有關係，文質之爭本屬無必要。西塞羅譯的是希臘前人的演說，希臘文史哲傳統素重修辭，最優秀之演說家必須詞藻亮麗，感染力強，故譯文務須保留原篇的效果，毋須逐字對譯，顧質而傷文。另一位古羅馬文學家賀拉斯 (Horace) 在公元前二十年 “Imitating in Your Own Words from Art of Poetry” (詩之藝術·採己言模擬) 一文中亦反對逐字對譯，認為這是奴隸式捆手絆腳之舉 (同上:14-15)。其實對羅馬人而言，翻譯的功能不只為了解原文，雖然拉丁文是羅馬帝國的通用文字，但希臘文當時是文化修養的表徵，羅馬知識分子多通曉希臘文，把希臘文翻譯為拉丁語，目的之一是透過翻譯吸收希臘黃金傳統，豐富本國文化文字。此外，他們視譯文為始於原文的超語篇 (metatext)，透過翻譯可比較原文與譯文的文體風格，並作其他對比研究，故讀者或譯者在乎的不單是原文的內容，更重要的是譯者發揮語言創造力，透過翻譯模倣學習古代賢人聖哲，以臻至善 (the sublime) (Bassnett, 1980:43-45)。這樣的目的自然主宰了翻譯的取向。這觀點與魯迅主張通過翻譯使白話表現法更精密，使白話文學更豐富有異曲同工之妙。

至於中國最早期的譯論，則源自佛典翻譯，佛典所載乃佛祖高僧的聖言教義，宗教文章地位超然；尤其佛教思想傳入中國之初，僧侶對經文皆抱有虔敬之心，加上譯經經驗有限，唯恐違背經旨，故漢魏三國時多採直譯。“維祇難曰：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

法不以嚴；其傳經者，當令易曉，勿失厥義，是則為善。” (陳福康，1992:14-17；馬祖毅，1984:22-24) 當時譯經多由胡僧口傳，漢人筆受，中土讀者不懂原文，自然斤斤計較於經文之字比句次，奉原文若天書，不敢逾越。譯經讀經只為明佛學道，不求超越原文，亦未打算透過翻譯模倣天竺文化以補足恢弘博大的漢文化。傳經但求意義不失，文字方面也就只求易曉，彷彿稍加文飾就有損於本旨。支謙的同袍亦爰引本土文化中相關的文藝美學觀點作證，“座中咸曰：老氏稱：‘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明聖人意，深邃無極。今傳胡義，實宜徑達。”

(同上) 這樣，經過一輪像現代翻譯坊 (translation workshop) 式的討論，本來“季世尚文”、“初嫌其辭不雅”的支謙亦依從傳統美德，恪守聖人之言，不敢稍越雷池，復未能像嚴復般 (〈天演論·譯例言〉) 搬出孔子的“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作反證，只好在理論上支持“質直”派，定下“因循本旨；不加文飾。譯所不解，則闕不傳”的原則，亦即今天我們說的翻譯指令 (translation instruction)，依從眾人的共識。然而在實踐上，他始終漢化甚深，陽奉陰違 (任繼愈，1981)，像嚴復般未有堅守自己所定的規條，梁啟超就認為他屬“未熟的意譯一派”

(1998:155)，譯文“辭旨文雅”。加上當時佛教初入中國，時人多拿本土道術作比附，支謙備通內典與老莊，不免時而把佛教玄學化 (湯用彤，1997:89-95)。

由此可見，翻譯理論固然源於實踐，但實踐又往往繫於現實情況、時代潮流、讀者需求、原文文化與譯文文化的相對優勢，更與原文和譯文所植根的文史哲傳統有莫大關係，現代翻譯研究的蓬勃令我們對傳統的了解更加深刻。中國傳統不重視純知識活動，學優

而仕原以代耕，所在乎者為濟世利民，政治教化，非以實踐應用為本的理論備受冷待，得不到健康的發展。例如先秦名家“控名責實，參伍不失”，主張名實相符，強調邏輯分析，區分現象與概念，明白事情的相對性與差異性，這種好奇、耽思與探索的精神當初若能得到堅持與延續，必富無窮的創造性，今天我國的學術面貌亦會截然不同，而上文所詳述翻譯研究的術語名稱混淆問題也很可能不會發生。可是先哲不好漫無目的式抽空論理，教育選仕制度亦不鼓勵孤往獨到式剖析求真，以致名家對純粹知識、理形的探求落得“苛察繳繞”的指控。其實孔子提出了“下學而上達”的卓越理想，下學的內容亦十分廣泛，當時有禮、樂、射、御、書、數之類，而儒學亦十分重視知識，明德悟道之功夫始於“格物致知”，惟最終目標是轉識為智，轉智為德，契接天道，而非為純知識本身。此外，墨子特重求事情之所以然，重觀察經驗，又提出所謂“三表”的論證法，方法頗為科學，惜太重於“利”與“用”，有淺薄短視之流弊。中國原以農立國，實用主義傾向根深蒂固，加上諸子學說主要因應周道疲憊而興，出發點在撥亂反正，作出政治改良與社會改良（當中固亦有如道家般的消極厭世派，不屑作以心為形役的知識追求），自有其局限性，述著簡短，系統性不強，側重表現形式。而暴秦遏制自由思想，漢武獨尊儒家修身治國之術，後世亦重仕農而抑工商，尚心性而輕純理，加上後學不濟，淺陋者或只說不做，或只徒於人倫日用，以致傳統思想制度不但與現實、時代脫節，更未能開出純知純理的格局。透過跨領域的翻譯研究，對比我國和外國的文史哲傳統，我們可更深了解自身的文化母體，揚長棄短，發揮傳統優勢，並發掘從前被固有建制壓迫的聲音，可見嚴肅的翻譯學術研究有助我國的長遠發展。而對本科進行反思式的歷史

解讀乃當今各科的一大潮流。

又如中國翻譯大家嚴復，中國學者均認同是我國有系統的翻譯理論之始。嚴復就以往零篇殘雜、理論基礎薄弱的翻譯技巧辯論推陳出新，繼往開來，提出歷百年不衰的“信達雅”論，在中國翻譯學肯定佔一重要席位，就是以全球翻譯學的視野去看，嚴復對翻譯的見解亦有很大程度的普遍性。“信達雅”翻譯標準與西方傳統翻譯標準固然有不少共通點，而近日不少學者研究嚴復，已不復只談他的翻譯標準，而是從譯者的翻譯目的 (skopos)、個性背景和文藝美學取向 (poetics and aesthetics)、當代世界思潮和本國人心趨向 (ideology)、兩國的相對政治經濟實力 (relative power)、兩個文字文化系統間的實力差距 (polysystem)、讀者對譯文的接受性 (reception)，以至於譯出語與譯入語文化哲學的調適和操控 (acculturation and manipulation) 等種種角度出發（見王宏志，1997；黃忠廉，1988）。這樣實事求是地研究嚴復，我們可發現其翻譯的實踐途徑殊堪玩味，當中所涉課題甚多甚廣，與其他學科如文藝美學、哲學、人類學、文化研究、後殖民研究的某些課題殊途同歸。而研究嚴復自己對中西會通的卓見與不足，不但對我們今天立足中國，放眼世界有很大裨益，就是其對外國文化、學術、社會制度的詮釋、調適、比附手法，也對外國的翻譯研究有參考作用¹¹，誠是一個發掘不盡的研究課題。這樣，嚴復與嚴譯研究就可以與時並進，給我們新的啟發，我們就不用老圍着“信達雅”繞圈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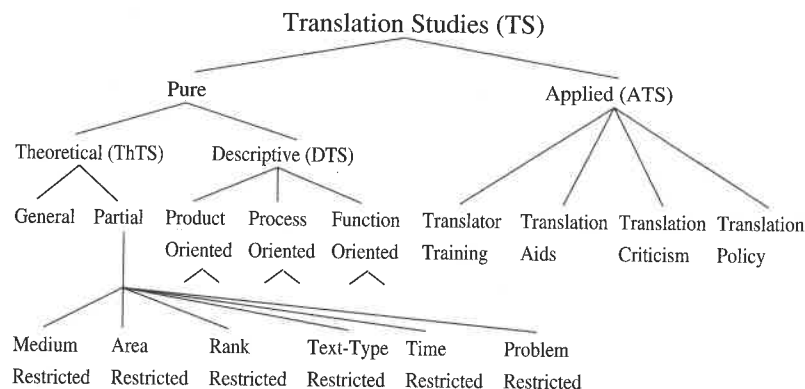
其實，西方學者亦透過翻譯研究提升對自身的文化母體的反思，並認同與其他體系對話的必要；一些人甚至意識到舊日歐洲學說有霸權主義之嫌（見Bassnett, 1998:130），認為雙方必須停止按自己的參考系去對對方作出類推、比附，才能夠站在對方的立場看

對方，達到真正融通，而這需要在國際社會文化教育的層面上作出鉅大的投資，即對讀者進行再教育（見 Lefevere, 1999:75-78）。出版政策亦需要作出調整。近日有本國學者提出中國翻譯研究國際化問題，如上文所述，中國翻譯研究跟所謂歐洲翻譯研究、北美翻譯研究、英國翻譯研究全屬下位概念，在中國研究翻譯而要國際化，我看主要目的是要把我國翻譯研究的成果向世界推介，並認識外國翻譯研究的成果，把一個地區根據其本身所屬系統和研究對象所作的局部研究的讀者群擴大，讓世界各地的學者各取所需，以收知己知彼，互動發祥之效。而最基本要做的事情，除成立正式的翻譯學系、翻譯研究所、翻譯學刊作為世界翻譯學者的交流點外，就是翻譯。國際翻譯工作者聯會 (FIT) 於一九五三年正式成立，但到一九八七年國際譯聯第十一次世界大會在荷蘭舉行，中國才正式加入譯聯為團體會員，中西兩地的交流更進一步。但要習慣分析形合性的歐洲語言的歐美學者看中文，有實際語言、概念方面的困難，更遑論要他們完全理解，我們當然不願意看到他們對中國的掌握限於東方學說之流。這樣，我們部分人就有責任把我國翻譯研究的成果翻譯為外文，在外國出版，把論文投到歐美的學刊（見王寧：1998），讓外國讀者學者分享我們的研究成果，這與我們同時以中文寫作是毫無抵觸的，彼此都是透過不同的手法對翻譯學作出貢獻。正如牟宗三先生說，中國哲學有一種智慧，可以消融西方式的宗教、哲學而不見礙（1963:7），筆者認為在全球國際化的今天，要西方人克服中西之間語言、概念方面的障礙難，而我們消除中西之間語言、概念方面的障礙則較易，筆者的論據是以中國文字文化的意合、主體、綜合特性駕御西方文字文化的形合、客體、分析特性。故中國翻譯學應該立足中國，面向世界，這不是為了甚麼“超

英趕美”，蓋大家各具特性，地位平等，沒甚麼好趕，沒甚麼要追。

徐光啟有云：“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會通之前，必先翻譯。”從現代翻譯學的眼光去看，這翻譯不限於把語篇由甲文字翻譯成乙文字，或通過雙語轉換過程了解甲文化乙文化，而是牽涉到兩個龐大體系之間各種千絲萬縷的關係。這要通過翻譯學、翻譯研究，也就是中西以至全球會通的一個必然途徑。

圖一 霍姆斯的翻譯研究學科構架（參考 Toury, 1995:10）



註譯

¹ 本文初稿於1999年12月上海翻譯研討會上宣讀，原題為〈中國化抑全球化——世紀末中國翻譯研究之反思〉。

² 論及翻譯學科術語的文章很多，可參考勞隴，1999；楊自儉，1994；譚載喜，1987；董宗杰，1984等。

³ 有關中國翻譯學應否具有、如何具有“中國特色”的討論，可參考王東風，1999；胡清平，1999；金隄，1998；譚載喜，1998；劉宓慶，1991，1990；桂乾元，1986等。

⁴ 對於“translation”、“translation studies”、“science of translation”、“translation theory”、“translatology”等詞的發展與異同，*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uttleworth and Cowie, 1997) 有十分明確的分析。

⁵ 以此命名的學刊有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⁶ 以此命名的專書有黃龍，1998；黃振定，1998；張柏然、許鈞，1997；何偉傑，1989。學刊有《翻譯學研究集刊》/*Studies of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台北：中華民國翻譯學學會）。《譯學叢書》有好幾套（北京：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台北：文津出版社）。但有些書則名不副實，如張振玉的《譯學概論》（台北：人人書局，1968），英文書名是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是講雙語轉換原則的書。

⁷ 直接取名“Translation Studies”的專書有 Bassnett, 1980; Snell-Hornby, 1988; van Leuven-Zwart & Naaijken, 1991，學報則有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Translation Studies Abstracts* (Manchester: St. Jerome)、*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翻譯學報》（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叢書有 *Translation Studies Se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翻譯研究叢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翻譯研究論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翻譯研究論文集》（北京：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中國翻譯研究叢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⁸ 此類學刊有《中國翻譯》/*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北京：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翻譯季刊》/*Translation Quarterly*（香港：香港翻譯學會），專書論文則不勝枚舉。

⁹ 此類專科工具書有 *An Encyclopaedia of Translation: Chinese-English · English-Chinese*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5)、*A Topical Bibliograph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hinese-English · English-Chinese*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5)、《中國翻譯詞典》/*A Companion for Chinese Translators*（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7)、*Bibliograph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8)、*Routledge Encyclopaedia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此處順道一提《中國翻譯詞典》對“翻譯學”一條的闡釋：“翻譯研究不能成為一門科學？有些人持否定態度〔…〕另一些人則有不同看法〔…〕而用‘翻譯學’一詞便可做到名正言順”，似乎這“科學”的夢魘仍揮之不去；接着簡介不同學者就建立翻譯學的意見，就頗能做到客觀中肯（請參照註4）。

¹⁰ 筆者從佛學角度看，以為無可能亦毋須一體，蓋形相 (manifestations) 萬象，諸法諸相隨念而起，定相、知識固有“偏執性”，求其折衷亦必有所偏。而所謂一體、全球化，實為經折衷權宜的相對妥協。

¹¹ Venuti, 1998:158-189 論述嚴復與林紓將翻譯作為捍衛民族、民族現代化的手段；Lefevere, 1998:12-24 就中西方對翻譯取態之不同亦有精彩論述。

參考書目

- 陳福康（1992）《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董宗杰（1984）〈發展翻譯學，建立專業隊伍〉。《中國翻譯》，8：37-38。
 何偉傑（1989）《譯學新論》。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金隄（1998）《當代翻譯探索》。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桂乾元（1986）〈為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翻譯學而努力——從國外翻譯學談起〉。《中國翻譯》，3：12-15。
 胡清平（1999）〈澄清翻譯理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國翻譯》，5：2-5。
 黃龍（1998）《翻譯學》。南京：甘肅教育出版社。

- 黃振定 (1998) 《翻譯學：藝術論與科學論的統一》。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黃忠廉 (1988) 〈重識嚴復的翻譯思想〉。《中國翻譯》，2：6-8。
- 勞隴 (1999) 〈甚麼是翻譯學 (translatology)？翻譯科學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一對翻譯理論研究“沉寂期”的思考〉。《中國翻譯》，5：43-45。
- 梁啟超 (1988) 《中國佛教研究史》。上海：三聯書店。
- 劉靖之編 (1991) 《翻譯新論集》。香港：商務印書館。
- (1981) 《翻譯論集》。香港：三聯書店。
- 劉必慶 (1991) 〈中國現代翻譯理論建設芻議〉。《中國語文通訊》，14：11-16、21。
- (1990) 《現代翻譯理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羅新璋編 (1984) 《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 馬祖毅 (1984) 《中國翻譯簡史》。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
- 牟宗三 (1983) 《中國哲學十九講》。台北：學生書局。
- (1963) 《中國哲學的特質》。台北：學生書局。
- 任繼愈編 (1981) 《中國佛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沈蘇儒 (1998) 《論信達雅—嚴復翻譯理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譚載喜 (1998) 〈翻譯學必須重視中西譯論對比研究〉。《中國翻譯》，2：12-16。
- (1987) 〈必須建立翻譯學〉。《中國翻譯》，3：2-7。
- 湯用彤 (1997)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王東風 (1999) 〈中國翻譯研究：世紀末的思考〉。《中國翻譯》，1：7-11；2：21-23。
- 王宏志 (1997) 〈重釋「信、達、雅」—論嚴復的翻譯理論〉。《翻譯學報》，1：36-62。
- 王寧 (1998) 〈翻譯研究的國際化之我見〉。許鈞編，《翻譯思考錄》(頁554-557)。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 許鈞編 (1998) 《翻譯思考錄》。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 許思園 (1997) 《中西文化回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楊自儉 (1994) 〈關於建立翻譯學的思考〉。楊自儉、劉學雲編，《翻譯

- 新論 (1983-1992)》(頁325-333)。武漢：河北教育出版社。
- 楊自儉、劉學雲編 (1994) 《翻譯新論 (1983-1992)》。武漢：河北教育出版社。
- 張柏然、許鈞編 (1997) 《譯學論集》。南京：譯林出版社。
- 張振玉 (1968) 《譯學概論》。台北：人人書局。
- 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翻譯通訊》編輯部編 (1984) 《翻譯研究論文集》。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Bassnett, Susan (1998)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 in 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1980)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Goffin, Roger (1971) “Pour une Formation Universitaire ‘sui generis’ du Traducteur: Reflexions sur Certains Aspects Methodologiques et sur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dans le Domaine de la Traduction”, *Meta* 16:1-2, 57-68.
- Harris, Brian (1977)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 *Meta* 22:1, 90-92.
- Holmes, James (1988)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Holmes (eds.)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Rodopi, 67-80.
- Koller, Werner (1989)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ed by Andrew Chesterman), in Andrew Chesterman (ed.):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 Finland: Oy Finn Lectura Ab, 99-104.
- Lambert, José (1991) “Shifts, Oppositions and Goa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owards a Genealogy of Concepts”, in Kitty M. van Leuven-Zwart & Ton Naaijken (eds.)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State of the Art*. Amsterdam: Rodopi, 25-37.
- Lefevere, André (1999) “Composing the Other”, in Susan Bassnett & Harish Trivedi (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75-94.
- (1998)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 in 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2-24.

Newmark, Peter (1988)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Hemel Hempstead: Prentice Hall.

Nida, Eugene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fic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Leiden: E.J. Brill.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1993+) Copenhagen: Museum Tusculanum Press.

Popovič, Anton (1976) *Dictionary for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Edmonton: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Alberta.

Pym, Anthony (1992) *Translation and Text Transfer: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Radó, György (1979) "Outline of a Systematic Translatology", *Babel* 25:4, 187-96.

Robinson, Douglas (1997)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Manchester: St. Jerome.

Shuttleworth, Mark and Cowie, Moira (1997)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anchester: St. Jerome.

Snell-Hornby, Mary (1988)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Revised Ed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Toury, Gideon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Van Leuven-Zwart, Kitty M. & Naaijken, Ton (eds.) (1991)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State of the Art: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James S. Holmes Symposium on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Rodopi.

Venuti, Lawrence (1998) *Scandals in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Wilss, Wolfram (1982)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Yip, Wai-lim (1969) *Ezra Pound's Catha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r Translation Studies?

Leo Tak-hung CHAN

Crosscurrents in the Literatures of Asia and the West, edited by Masayuki Akiyama and Yiu-nam Leung.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97. 235 pages.

For some years now much debate has centered around the question whether translation studies should be a sub-disciplin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r whether it should form the rubric under which the latter can be placed. Whatever the final resolution, the indissoluble link between the two disciplines seems to have been taken for granted by all parties concerned. It would thus be far better to conceive of the two disciplines as coexisting in a relationship of mutual contribution rather than exclusion. In fact, how comparatists can contribute to studies on translation is well illustrated by Makayuki Akiyama and Yiu-nam Leung's anthology of essays compiled in honor of the fam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cholar Owen Aldridge, aptly entitled *Crosscurrents in the Literatures of Asia and the West*.

For many the bane of present-day translation scholarship is the narrow, microscopic approach, often linguistically based, that excludes larger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questions which impact on translation. Since that approach has been dominant in the field for quite a while, it has led many to lose sight of the need for contextualizing translation as a human activity. A brief examination of six essays from *Crosscurrents* will afford us a glimpse into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hich can enhance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especiall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Wai-lim Yip's engagement with Ezra Pound's Daoist project (though he notes the way in which it conflicts with Pound's Confucian leanings) in

his "Ezra Pound's Tensional Dialogue with 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Nature" is a continuation of his decades-long work on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 of Pound. Pound's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poetry of essences" is illustrated through an analysis of such poems as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The Coming of War: Actaeon," and a number of the Cantos. By way of a careful comparison of the poetic methods used by Pound, which reflect his determination to promote the viscosity of images and his concern to bring out things as they are (as opposed to their being mediated through language), with Daoist views of the immanence of things in nature, Yip proves Pound's indebtedness to Daoism in his creation of his own brand of symbolist poetry. Of relevance to the translation scholar, beyond this specific debt, is Yip's analysis of how Pound "translates" the idiosyncras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lthough the Chinese language also has articles and personal pronouns, they are often dispensed with in poetry. . .there is the absence of connective elements (prepositions, conjunctions), and these, aided by the indeterminacy of parts of speech and no-tense declensions (which give us back a sense of time before artificial demarcations), afford the reader a unique freedom to consort with the real-life world. . .The asyntactical and paratactical structures promote a kind of prepredicative condition wherein words, like objects in the real world, are free from predetermined closures of relationship and meaning and offer themselves to us in an open space. (p.97)

More in the nature of a chapter on Japan's translation history—rather than literary history—is Shunsuke Kamei's "Mark Twain in Japan, Reconsidered." Kamei correctly emphasizes target reception as a crucial element determining when and how Mark Twain's works, in particular *Tom Sawyer* and *Huckleberry Finn*, got translated. Because British and European literary models, considered to be more refined and thus more akin to those of the Japanese, were generally preferred, for a long time Mark Twain only

found acceptance in Japan as a humorous and juvenile writer. It was not until the thirties that more serious views of Twain were taken, and not until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at admirable and *dependable* translations of Twain began to appear. Due to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more socio-political than literary, Twain's masterpieces were eventually accepted in Japan via translations, and they found a home there with their "Americanness."

In contrast to Kamei's study of a Japanese example of reception via translations are two studies in the same anthology addressing issues of influence on particular authors in Japan.⁸ However, while they bring to light literary links formerly unrecognized, the role played by translations in forging the linkage is rather briskly passed over in the discussion. This is perhaps regrettable from the translation scholar's point of view. Matoshi Fujisawa in his "The Role of Ogai Mori's Translation of Hans Christian Andersen's *Improvisatoren* in the Poetical Works of Takuboku Ishikawa" points out, as none has done before him, the way in which Takuboku borrowed themes, images and phrases from Andersen's novel *Improvisatoren* for use in his poetry. The most notable case is his short poem "A Blind Girl." The borrowing in this case was effected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by Ogai in 1901, but as Fujisawa himself says, its influence on young Meiji writers has yet to be properly assessed.

In "Koyo Ozaki's *The Golden Demon* in the Light of Western Fiction," Yoko Matsui considers in turn three likely sources for Ozaki's highly popular nineteenth-century novel *The Golden Demon*: Bertha Clay's *Dora Thorne*, Alice Hamilton's *White Lilies*, and Emily Brontë's *Wuthering Heights*. From the manner in which Matsui's arguments are presented—especially the lengthy treatment she gives to the thematic parallels she discerned between Ozaki's novel and Emily Brontë's—it appears obvious that she is inclined to consider Hamilton or Brontë as Ozaki's actual source. Yet perhaps a highly significant point to bear in mind is that *Dora Thorne* was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in 1887, while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a translation of *White Lilies* around that

time (pp.171-73). (The case for Brontë is weak, since Ozaki spoke of an American, not a British, source in the first place.) Could sufficient attention paid to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translations in cases of textual influence enable the literary historian to come up with rather different conclusions?

In *Crosscurrents* one also sees "translation" treated in its broader, metaphoric sense, much as one would say, "Ideas do not easily *translate* into action." These days, among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s, translation often is used in this kind of metaphoric sense—an example of the "syllogistic, or logical, mode of metaphor" (p.112) mentioned in Eugene Eoyang's essay on "Metaphor in the Sciences and in the Humanities: Logic, Rhetoric, or Heuristic?," also featured in the anthology. Two comparatists look at the way ideas in the West were translated into China and Japan: John T. Dorsey at enlightenment concepts in his "Shades of Enlightenment: Concepts of Modernization and Westernization in Meiji Japan," and Dai-yun Yue at "new theories" in the eighties in her "Cultural Discourse and Cultural Intercourse."

Dorsey begins by reviewing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 for the term "enlightenment" in the Meiji era—*bunmei kaika*—with its oblique references to light (*mei*), opening up, and even the blossoming of a flower (*kai*). On the basis of this he delineates the Japanese incorporation of ideas connected with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like reason, for instance) by a generation of thinkers like Fukuzawa Yukichi.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ccording to Dorsey, it was hoped tha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 spirit of rationality, knowledge, and wisdom, Japan could be initiated into modernity. Further, Western Christianity was thought to be synonymous with enlightenment. The irony of this is that Enlightenment thinkers in Europe were led to their rejection of the irrational beliefs of Christianity by a fascination with Eastern ways of thought in the first place. To Dorsey:

[they] were fascinated with Eastern thought, cultur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nd without much knowledge, idealized them as "natural" and "rational" in

opposition to the artificial and irrational beliefs of Christianity that stultified thought and arreste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enlightenment criticism of Shintoism,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in Japan was based on rational assessment, in part on the imported Christian view that such religions were primitive idolatries, but in most part to the imported Christian view that such religions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keenly felt civilization gap with the West. (p.66)

The simple fact is that ideas were *translated* all too freely: the need for "faithfulness to the original (idea)" was obviously neglected by both the Meiji Japanese and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thinkers.

While Dorsey deals with the way Japan imported Western idea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Yue tackles a similar situation confronti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eight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o-called "Cultural Fever." Within the span of a few years from around 1985 to 1989, poststructuralist ideas from the West (including postcolonialism, feminism, new historicism, and so on) entered—or became translated for—China rather hastily, causing great critical confusion. Questions of China's reception of these ideas became even more thorny when one considers the fact that, to begin with, such ideas themselves arose in the West in different times. According to Yue, present-day intellectual discourse in China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neither foreign nor totally native," but she is still hopeful that eventually a meaningful dialogue can be built up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a dialogue "woven by a longitude of history and a latitude of different cultures" (p.38). Only in that way would true "translation" occur.

While *Crosscurrents in the Literatures of Asia and the West* does not advertise itself as a publication in the catego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but rather, a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estern and East Asian"—it does not mean that translation scholars cannot benefit from the insights offered there. Masayuki Akiyama and Yiu-nam Leung have done an admirable job

assembling scholars in the forefront of comparative East-West literary studies and presenting us with a collection of essays that faces squarely issues of literary history instead of theorizing on an abstract level. In the context of my present review, I recommend it to those scholars of translation who wish to see our research field broadening out to encompass the multifarious realms of human activity (literar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in which it is inextricably enmeshed. A pertinent question raised by the essays in *Crosscurrents* is: How can the translation scholar learn from the comparatist?

*Several essays in *Crosscurrents* that are in the category of parallel studies (of themes, motifs, etc.) are not reviewed here because the possibility of direct influence is either ruled out or obviously impossible. For instance, comparisons are made of the sixteenth-century English play *Arden of Feversham* and the Yuan play *Kan Tou Chin* (I-chun Wang); the dystopian tales of *Animal Farm* and *A Utopian Dream* (Koon-ki Tommy Ho); Takeo Arishima's *A Certain Woman* and Henry James's *The Portrait of a Lady* (Masayuki Akiyama); "The Revolt of Mother," in *Liu Village* and *The Color Purple* (Kai-chong Cheung); and Mao Dun's *Midnight* and Emile Zola's *L'argent*, which Mao Dun explicitly denied having read (Yiu-nam Leung).

論文摘要 Abstracts

論“信達雅”說在中國傳統翻譯理論中的位置

The place of “Xin-da-ya” in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CHU Chi Yu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ong-debated tripartite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proposed by the late Qing scholar Yan Fu a hundred years ago. It will clarify the meaning of “xin-da-ya”, or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from both the author’s point of view and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compare it with the theory developed by the Buddhist translators of ancient times, and with its later versions by modern scholars; and reassess its applicability in contemporary practice. Yan Fu’s theory has dominated Chinese theory of translation for a hundred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ill-defined traditional idea of “faithfulness” appears vague and empty.

舊題新解：從國際互動看中國翻譯

Old Issues in a New Light: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in an Interactive World

ZHU Chun shen

The article, written in Chinese, tries first of all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wo concepts, i.e. ‘Chinese(-related)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which have for too long been packed in a fuzzy notion of Zhongguo fanyi, or ‘China’s translation (studies)’. It then argues for the relevance of so-called ‘foreign translation theories’ to Chinese-relate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a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To substantiate the argument, it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rpreting, in the light of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the time-honoured translation principle of faithfulness-accessibility-elegance.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lack of interaction with translation studies related to other languages/cultures has led to a prolonged waste of energy on debating whether translation (studies) is a science or an art. The issue, it argues, is actually a matter of (different) approaches rather than the identity of the discipline.

Globalization, Cultural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WANG Ning

Since we are now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Cultural Studies has made a penetrating impact on all the research fields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cluding translation studies. Starting from discussing issues of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author tries to re-define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udies in an attempt to theorize China's translation studies by associating it to the issues of Cultural Studies. Meanwhile, the essay offers its author's new distinction between "linguistic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on the basis of his critique of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and issues in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circles.

繼往開來 融通中西——二十一世紀中國翻譯研究展望 Tradition and Conciliation: The Prospec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AN Kit Ying Elsi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spect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in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t first addresses the present problem of Chinese nomenclature and examines the contra-distinction betwee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ology",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s the name of the discipline; the first three are considered commonly acceptable superordinate terms while the last two attributive and localized hyponyms. Secondly, it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specifying the scope of the discipline, as outlined by James Holmes and Liu Miqing, to map any research endeavour in proper perspective, which will clear away confusion and reconcile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theories. Finally the paper projects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legitimate means of globalization, through consolidating the Chinese tradition, by historical reflection and redressing its want of reason and methodology, and through mediating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作者簡介 Notes on Contributors

朱志瑜 畢業於天津外國語學院英語系，香港大學英文系比較文學專業博士，曾任 *Renditions* (譯叢) 助理編輯，現任教於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系，教授基礎翻譯、翻譯理論、翻譯史等課程，目前主要研究項目為中國傳統翻譯理論。

朱純深 諾丁漢大學博士，曾於福建師範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擔任翻譯及文學等課程的教學，後加入香港城市大學，在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任助理教授。現為中國譯協翻譯理論與翻譯教學委員會委員及加拿大翻譯研究協會海外會員。其學術論文曾發表於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Meta*、*Target* 及 *Multilingua* 等學刊上，譯作包括《短篇小說寫作指南》、讀者文摘《當代小說選粹》選篇，以及一系列中國古典詩詞和新加坡當代華語詩歌英譯。

WANG Ning (王寧) holds a Ph.D and is Chair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at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Among his numerous recent publications a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Culture* (1996), *After Postmodernism* (1998) and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in Europe* (1999). His English articles have appeared in such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s *New Literary History*, *boundary 2*, *Social Semiotics*, *Perspectives*, *Ariel*,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amkang Review*.

張南峰 香港大學翻譯科文學士和哲學碩士，英國沃里克大學翻譯研究哲學博士。曾任香港城市理工學院人文及社會科學部翻譯課程高級講師，現任香港嶺南大學翻譯系副教授。譯作包括《王爾德喜劇選》、《好的首相》，論文見於 *Babel*、*The Translator*、*Perspectives*、《外國語》等刊物。

陳潔瑩 香港城市大學語文學部講師。畢業於城市理工學院(高級文憑)及中文大學(文學碩士)，現於英國沃里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為香港翻譯學會幹事，英國語言學會會員，澳洲國家翻譯及傳譯評審局認可翻譯員。曾任政府中文主任。著有論文〈香港翻譯概況：過度九七，邁向廿一世紀〉、〈漢譯佛典權勢考〉等。

Leo Tak-hung CHAN (陳德鴻) (Ph.D. Indiana University, 1991) is currently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Lingnan University. He also taught previously at the 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and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USA). Dr. Chan's articles on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have appeared in journals lik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Babel*,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and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His most recent book is *The Discourse on Foxes and Ghosts: Ji Yun and Eighteenth-Century Literati Storytelling*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e is also Founding Editor of the bilingual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Editor of *Translation Quarterly* since 1997, and Advisory Board Member of *TTR: Traduction, Terminologie, Redaction*.

稿約凡例

《翻譯季刊》為香港翻譯學會之學報，歡迎中、英文來稿及外譯中之翻譯作品（請附原文及作者簡介）。有關翻譯作品版權問題，請譯者處理。

一、稿件格式

1. 來稿一式三份，請用原稿紙謄正，打字稿更佳。
2. 來稿請用另頁附上：1. 作者姓名；2. 任職機構；3. 通訊地址／電話／傳真／電子郵件地址。
3. 來稿均交學者審評，作者應盡量避免在正文、註釋、頁眉等處提及個人身分，鳴謝等資料亦宜於刊登時方附上。
4. 來稿每篇以不超過一萬二千字為宜。
5. 來稿獲審評人建議刊用後，如論文為打字稿，請附錄有該文件檔之電腦磁片，並註明檔案格式。

二、標點符號

1. 書名及篇名分別用雙尖號（《》）和單尖號（〈〉），雙尖號或單尖號內之書名或篇名同。
2. “”號用作一般引號；‘ ’號用作引號內之引號。

三、子目

各段落之大小標題，請依各級子目標明，次序如下：

一、 / A. / 1. / a. / (1) / (a)

四、專有名詞及引文

1. 正文中第一次出現之外文姓名或專有名詞譯名，請附原文全名。
2. 引用原文，連標點計，超出二行者，請另行抄錄，每行入兩格，凡引原文一段以上者，除每行入兩格外，如第一段原引文

為整段引錄，首行需入四格。

五、註釋

1. 請用腳註。凡屬出版資料者，請移放文末參考資料部分。號碼一律用阿拉伯數目字，並用（ ）號括上；正文中之註釋號置於標點符號之後。

2. 參考資料

文末所附之參考資料應包括：1. 作者／編者／譯者，2. 書名、文章題目，3. 出版地，4. 出版社，5. 卷期／出版年月，6. 頁碼等資料，務求詳盡。正文中用括號直接列出作者、年份及頁碼，不另作註。

六、摘要

來稿請附英文標題及不超過一百五十詞的英文摘要。

七、版權

來稿刊登後，版權歸出版者所有，任何轉載，均須出版者同意。

八、書評

中文書評格式與中文稿例同。

九、贈閱本

論文刊登後，作者可獲贈閱本三冊。書評作者可獲贈閱本兩冊。凡合署者，以均分為原則。

十、評審

來稿經本學報編輯委員會審閱後，再以匿名方式送交專家評審，方決定是否採用。

十一、來稿請寄：新界屯門嶺南大學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轉《翻譯季刊》編輯收。

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1. The *Translation Quarterly* is a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Contributions should be original, hitherto unpublished, and not being considered for publication elsewhere. Once a submission is accepted, its copyright is transferred to the publisher. Translated articles should be submitted with a copy of the source-text and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text author. It is the translator's responsibility to obtain written permission to translate.
2. Manuscripts should be typed on one side of the page, double-spaced and submitted in triplicate.
3. Besides original articles and book reviews, review articles related to the evaluation or interpretation of a major substantive or methodological issue may also be submitted.
4. Footnotes should be kept to a minimum, typed single-spaced, and placed at the bottom of each page. Page references should be given in parentheses, with the page number(s) following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year of publication. Manuscript styles should be consistent; authors are advised to consult the MLA Handbook for proper formats.
5. Chinese names and book titles in the text should be romanized according to the "modified" Wade-Giles or the pinyin system, and then, where they first appear, followed immediately b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ranslations.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terms obvious to the readers (like *wenxue*), however, are not necessary.
6. Articles should be accompanied by an English title and an abstract of up to 150 English words.

7. There should be a separate Reference section containing all the works referred to in the body of the article. Pertinent information should be given on the variety of editions available, as well as the date and place of publication, to facilitate use by the readers.
8. All contributions will be first review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and then anonymously by referees for its suitability for public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Quarterly*. Care should be taken by authors to avoid identifying themselves on the first page, in the top or bottom margins, or in footnotes. A separate cover page with the title of the article, the name of the author and his/her 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 should be provided.
9. Book reviews are to follow the same format as that for submitted articles; they should be typed and double-spaced, giving at the outset the full citation for the work reviewed, plus information about special features (like appendices and illustrations) and prices. Unsolicited book reviews are as a rule not accepted.
10. Final versions of articles are to be submitted in a hard copy and a computer diskette to the Editor, *The Translation Quarterly*, c/o Centre for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Lingnan University, Tuen Mun, N. T.
11. Contributors of articles will receive three complimentary copies of the journal, but these must be shared in the case of joint authorship. Book reviewers will receive two complimentary copies.

《翻譯季刊》

Translation Quarterly

訂閱表格

Subscription Order Form

請填妥下列表格，並連同劃線支票抬頭「香港翻譯學會有限公司」，寄回：香港大埔汀麗路36號14字樓中華商務印刷轉香港翻譯學會《翻譯季刊》編輯助理收。

Please complete the following order form and return it together with a crossed cheque payable to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Ltd.**” to: Editor Assistant,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Ltd. c/o C & C, 14th Floor, C & C Building, 36 Ting Lai Road, Tai Po, N.T.

訂閱年期及費用（一年四期）：由第____期起

Subscription period and fee (four issues each year) From Issue No.____ onwards:

☐ 一年(One year) : HK\$240.00

☐ 二年(Two years) : HK\$480.00

姓名(Name) : _____

所屬機構(Affiliation) : _____

地址(Address) : _____

電話(Tel.) : _____

傳真(Fax) : _____